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宋興洲博士

The seal of Tunghai University i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scalloped outer edge. It feature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東海大學' at the top and 'TUNG HAI UNIVERSITY' in English around the bottom. The year '1955' is inscribed at the very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cross above a series of horizontal lines.

從政經改革探討國家競爭力之
提昇-台灣與南韓之比較

碩士班研究生：羅筱晴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5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分析.....	16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限制	24
第二章 1988-2008 年台灣政經改革.....	29
第一節 威權政體之歷史背景.....	29
第二節 李登輝時期(1988-2000)	31
第三節 陳水扁時期(2000-2008)	39
第四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47
第三章 1988-2008 年南韓政經改革.....	49
第一節 盧泰愚時期(1988-1993)	50
第二節 金泳三時期(1993-1998)	55
第三節 金大中時期(1998-2003)	60
第四節 盧武鉉時期(2003-2008)	66
第五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70
第四章 2008 年以後台韓政經改革與比較.....	73
第一節 馬英九時期(2008-迄今)	73
第二節 李明博時期(2008-迄今)	78
第三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81
第四節 關鍵時刻：比較台韓之政經改革.....	82

第五章 台韓國家能力與競爭力.....	87
第一節 台灣與南韓國家角色與能力之變化.....	87
第二節 關鍵時刻：台韓世界競爭力之排名.....	90
第六章 結論	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3
第二節 未來展望.....	108
參考書目	111

表目次

表：

表 1-1：台灣與南韓政經改革之關鍵時刻.....	25
表 2-1：六次修憲之主要內容.....	34
表 2-2：陳水扁執政八年施政滿意度趨勢表.....	46
表 2-3：陳水扁執政八年來各項施政滿意度排行.....	47
表 3-1：1988-2008 年韓國總統所屬政黨表.....	49
表 3-2：南韓政府主導與自由化時期政經體制比較.....	60
表 3-3：IMF 對南韓的紓困條件與內容.....	64
表 4-1：李登輝與陳水扁政經改革之異同.....	83
表 4-2：金泳三與金大中政經改革之異同.....	84
表 4-3：陳水扁與馬英九政經改革之異同.....	85
表 4-4：盧武鉉與李明博政經改革之異同.....	86
表 5-1：Michael Porter、IMD、WEF 對國家競爭力之定義.....	90
表 5-2：IMD 國家競爭力重要指標.....	91
表 5-3：WEF 全球競爭力主要指標.....	92
表 5-4：IMD 台灣與南韓 1996-2011 世界競爭力排名.....	93
表 5-5：WEF 台灣與南韓 2004-2010 全球競爭力排名.....	93
表 5-6：2003-2004 年 WEF 的台灣競爭力排名.....	96
表 5-7：2001-2006 年 IMD 台灣競爭力排名.....	97
表 5-8：2006-2008 年 WEF 台灣競爭力排名.....	98
表 5-9：2006-2008 年 WEF 台灣與南韓排名比較.....	98
表 5-10：2008-2011 年 IMD 台灣主要指標排名.....	100
表 5-11：2008-2010 年 WEF 台灣各項指標排名.....	100
表 6-1：台灣與南韓總統制度之比較.....	104

圖目次

圖：

圖 1-1：本文主要架構圖.....	26
圖 5-1：台灣與南韓政經改革與國家能力變遷圖.....	89
圖 6-1：陳水扁與金大中之比較.....	106
圖 6-2：馬英九與李明博之比較.....	107

第一章 緒論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每個國家都在追求發展，而隨著市場的全球整合，國家之間的競爭力無所不在，政府更是全球競爭的關鍵，例如，健全的經濟政策、資源、財政赤字、強而有力的中央銀行等，都會影響經濟成長。

台灣和南韓曾經都是中國的屬地以及日本的殖民地，都深受中日兩國文化的影響。並在歷經了國共內戰與韓戰之洗禮後，兩國戰後的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模式、經驗、成就，受美國的武力保護、經濟、文化、政治影響，也都極為相似。而台灣與南韓也同屬亞洲四小龍，並且也都是以發展型國家模式，使得兩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耀人的表現。

而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台灣與南韓都堪稱是民主化成功的典範。因為兩國都是在分裂國家的困境下，均能以漸進、和平等改革方式，快速達成民主轉型的目標。但是在檢視台灣與南韓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到兩國可能面臨相同的問題，例如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是否能保持其主導的地位與能力，所以本文將同時以政治面與經濟面作為主要切入的面向，討論 1988-2010 年之間台灣與南韓歷任總統所實施的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並從中比較兩國領導人在面對危機時所做之決策，以及其對國家競爭力之影響，所以本文也將以國家中心論與歷史制度論作為主要研究的途徑。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國際社會中，國家的地位會由其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所影響。雖然一個國家在某方面實力強大，但並不表示其在其他方面都強大，但我們依然可以發現不同面向的實力，大體上是有關聯的，例如，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極其強大，而他在軍事或政治外交上也會有較大的競爭力。¹

二次大戰後，許多殖民地在政治上紛紛取得獨立，但落後國家在經濟方面要能夠持續發展，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多數的落後國家不只無法達到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更無法縮短與先進國家之間的距離。²然而，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是國際間有目共睹的，從 1950 年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到 1960 年代採取的出口導向政策，使得出口增加，經濟快速成長，因而與南韓、香港、新加坡通稱為「亞洲四小龍」，所以也成為了政治與經濟學家關心的焦點之一。隨後 Chalmers Johnson 則在 1982 年提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建立起戰後經濟發展不同於歐美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共產國家的統治社會主義的第三種模式，³其主要的概念是建立在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之上，而之後學者也經常使用發展型國家的模式，來解釋台灣與南韓的經濟發展。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東亞地區政治經濟成功轉型的各國，依靠的是國家機關在發展上引導了社會中經濟活動的轉變，因此，國家的角色在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功能。

¹ 呂亞力，2008，《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台北：東華，頁 116。

²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頁 5。

³ Johnson Chalmers, 1999,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Meredith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2-60.

但是在歷經民主化與全球化，以及 1970 年代兩次的石油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世界金融風暴，各個國家經濟體都遭遇不同的困境，卻面對幾乎相同的威脅，這些也顯示出了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使得發展型國家模式也遭受到了挑戰，而這不只會對國家的行動力有所限制，也對國內的制度、政府政策、結構都產生了可觀的影響，並且也有許多的學者認為，全球化已逐漸腐蝕國家，不僅國家在謀求社會及經濟福利上所能控制的資源已經萎縮，而且政府的正當性和權威在民眾眼裡也大不如前，在這些壓力之下，國家的自主性是否還能發揮，甚至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而且就算是有競爭力的國家也不一定能夠永續的發展，更何況是沒有競爭力的國家。所以，國家必須成為更加緊密且有活力的單位，才有能力應付全球競爭的壓力。⁴

從 1980 年代開始，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國家競爭力，並且也成為政府改革經濟體制的主要目標，而目前評估全球競爭力最負盛名的就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稱 IMD)，另一個則是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 WEF)。台灣與南韓雖同屬亞洲四小龍，且台灣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直到 2006 年之前，都是在韓國之前，但根據 2007 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 所發布的全球競爭力評比，南韓由 2006 年的第 23 名在 2007 年時挺進至第 11 名，更是首度超越台灣當時的排名(第 14 名)。總而言之，在這個動態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家會不斷遭遇新的競爭者，而政府又要如何幫助國家競爭？所以本文將主要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分為下列五個：

⁴ 李振昌譯，Richard Rosecrance 著，2000，《虛擬國家：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台北：聯經，頁 3。

第一，台灣與南韓政府為什麼想要在政治或經濟結構上做一個改革？而本文將主要從兩個因素做為分析，其一，可能是因為受到國際情勢(外在環境)的衝擊，導致整體經濟成長下滑另一個則可能是國內本身政治因素的改變，例如政黨輪替或政治領導者的不良行為，而使得政府在對外或對內的策略上有所轉變。

第二，在這整個政治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兩國分別運用了哪些策略？例如李登輝時期實施的修憲案，或是金大中時期對大企業結構、金融之改革，而在這過程中又會遇到菁英之間的何種權力對抗？所以在這部分本文也將使用路徑依賴之途徑，作逐步的探討。

第三，在政府做了改革之後，又會產生哪些效果？是否成功的達成了提升經濟發展的目標，本文則將分別從政治面與經濟面來分析。

第四，而這些改革又會對國家競爭力產生何種影響？台灣與南韓是否能保持著競爭力、永續發展？且在遭遇危機時，國家該如何發展？並提升競爭力，而台灣也必須在全球政治網絡中重新找到適當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第五，本文也將進一步的探討為何南韓在遭受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重創後，可以不只是安然的度過，且在 2000 年之後，南韓經濟快速的成長更成為國際間注目的焦點，反觀台灣競爭力近幾年來卻持續的下滑，而造成台灣經濟奇蹟的退色與南韓的後來居上，是否與政府政策、經濟結構、領導人的不適當有關？在歷經發展型國家模式以及市場自由化之後，國家又該扮演何種角色？我們也需要一個全球競爭動力的清楚方法，政府的政策是否

有效，從其他國家的例子中可以獲得何種改進，將在本文後續章節加以論述分析。

最後，國家競爭力也是本文主要討論的概念，而將運用 Richard Vietor(2007)在「國家競爭力」書中，所提出的策略、結構、資源及政府角色，探討一國的競爭力；並進一步主要將其定義為政府能有效的去執行其策略，同時維持其主導的角色，並在此過程中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能了解其國家發展的軌跡與脈絡，在加上一個完善的組織結構去有效的執行策略，如何的影響著政治穩定與經濟表現。而在 Michael Porter 的鑽石體系-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表現和企業策略和結構等四個要素中，政府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變數，因為政策也會對鑽石體系產生作用，認為一國領導人所實施之經濟政策對國家的競爭優勢有著很大的影響；並且在第五章討論國家競爭力時，也將運用洛桑管理學院(IMD)與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數據資料作為觀察的指標，探討台灣與南韓的排名變化是否與政府的策略與角色有所關連。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政治學對制度與國家研究的再興，主要是源自於經濟危機，例如，石油危機、金融風暴等；並且也開始關注國家面臨危機時所產生的政策。⁵所以，在這一部分本文將運用國家中心論、歷史制度論、權力菁英論三種理論，並結合其精要，綜合分析出台灣

⁵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頁87。

與南韓的政經發展與競爭力並比較之。

一、國家中心論

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比較政治研究的傳統，而早期的研究也大多著重在「國家」的概念，但是之後隨著行為主義的盛行，學者開始轉移研究重心，從 195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中期，政治學的研究範圍幾乎沒有「國家」或「制度」的討論，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後，才開始轉變，而本文也將把幾個主要討論有關國家研究的學者，先分別闡述其概念，以便後續相關的討論。

1985 年 Theda.Skocpol 的「Brining the state back in」一文，開始了以國家中心論為主導並把國家當作一個研究途徑的研究。Skocpol 主要探討了國家在政治體系中是扮演行為主體或是制度結構，並且分別解釋了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所謂國家自主性，即只有當國家確實能夠提出自身的目標，並非僅僅是反應社會集團、階級、社團所需求的利益目標時，才有必要將國家看作是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而國家能力則是指國家實施上述官方目標時的能力，當政府面對社會團體的反抗時，政府能透過政策操作與權力，去達成他的政策目標。其企圖轉變國家在研究上被動的角色，並由歷史的脈絡解釋國家在政治變化的功能、國家利益為何？以及國家在政策議題的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⁶

至於 Nettle.J.P 則是認為國家概念應該被視為社會科學裡的一個變項，國家概念的發展和社會上的經驗現實有著極大的關係，並提出下列三點：第一，若從國內的角度來看，國家是一組 (a set of) 涵蓋功能與結構的集合體；第二，若在國際上，國家則

⁶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43.

代表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單位(a unit)，也就是說，在國內政黨、族群、利益團體、政府結合起來，才是一個國家；而在國際上，國家則是一個基礎、不可化約的單位，但此觀點在現在可能會受到跨國組織所影響；第三，國家是社會集合的產物，必須透過制度使國家概念化。⁷

而在 Joel.S.Migdal 的「The State in Society」的文章中，也說明了國家鑲嵌在社會中的概念，國家與社會關係是複雜的，⁸國家只是在社會中的其中一樣，就如同政黨、利益團體、官僚，必須彼此結合才可發揮其功能，沒有國家，社會也沒有用；沒有社會，國家也無法突顯出來。而他也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壟斷與強制的權力，但實際上大部分國家在制度與政策的運作上，國家強制能力其實是有限的。然而，Peter Evans 則運用了「鑲嵌自主性」的概念，描述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認為現在所有成功的國家，其國家機關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強調國家與企業組織的合作互利關係是國家發展的關鍵。⁹此外，學者 Almond 則認為國家只是一個平台，在分析工具上，國家並不實用，其主張多元主義¹⁰。

另外 Chalmers Johnson 則在 1982 年的日本政經發展研究文章中，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認為國家中的經濟官僚與政府部門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政府制定一套產業政策後，再透過行政指導的手段，說服企業界接受政府的政策，也就是由政府主導國內的經濟發展，¹¹而這個概念也將運用於本

⁷ Nettle. J. P, 1968,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In Alan S.Zuckerman(ed) *Comparative Politics :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Vol.2, pp.42-71.

⁸ Joel. S. Migdal, 2002, "The State in Society," In Wirda Howard J(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p.63-80.

⁹ Peter Evans, 1995, *Embedded Autonomy :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21-51.

¹⁰ Almond Gabriel A, 1988, "The Return to the State," In Alan S. Zuckerman(ed)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documents*, Vol.2, pp.134-160.

¹¹ Johnson Chalmers, 1999,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Meredith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

文論述的架構。

綜合以上論述，不論國家是一個單一的行為主體，或是制度結構的集合體，都會影響著國家是否都能規劃、執行自己的偏好，以及制度在面對國內與國際環境變遷時的反應，與後續國家發展等問題。

所以本文主要將以國家中心論中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概念，來探討有關國家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之下，國家角色與能力所遭受之衝擊，政府是否能保持主導的地位，因而影響政府的政策以及國家未來之發展，找出國家競爭力及如何提升競爭力。Peter Evans 在 1987 年「國家結構與國家政策：台灣經驗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意涵」的文章中，也將分析焦點放在國家機關上，說明了台灣經濟發展在於台灣具有一個市場取向的國家機器，而他也 在文章中提到，台灣是有當今世界上最強大，也最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機關，¹²所以一個國家必須具備能力，才能面對並解決來自內部與外部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若從國家發展層面來看，國家能力的定義是當國家面對挑戰時，國家有能力去進行市場改革，也有能力去回應外環境的變化，並接受挑戰，同時國家也有能力去控制國家未來的發展。¹³

另外，Fukuyama 指出面對 1980 到 1990 年代初期的自由化，雖然在開發中國家，國家部門經常是成長的障礙，政府也只能透過經濟自由化而有所整治，不過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將國家部門全面的縮減，而是使國家部門在某些領域強化，某些領域應該精簡，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2-60.

¹² Peter B. Evans、龐建國合著，龐建國譯，〈國家結構與國家政策：台灣經驗對興新工業化國家的意涵〉，《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43-53。

¹³ 陳啟清，2006，〈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與社會》，創刊號，頁 31-80。

這些不當的觀念也使得許多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失敗，甚至於在某些國家，由於尚未建立完善的體制框架，導致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反而越來越衰弱，¹⁴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沒有清楚的理解國家的性質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最後，就國家發展的角色而言，國家中心論者強調，國家的自主性依然有其重要性。Polidano 則提出了一個國家自主性的提升或降低是否來自國家的能力的關鍵性問題，並且使用歷史途徑進行檢視，提出了以下三點證明忽略國家自主性是錯誤的，第一，歷史討論是有價值的，雖然發生了金融風暴，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東亞地區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第二，政府不過度干預下，加速危機的發生，但台灣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是在政府強烈干預下，才降低金融危機的影響；第三，雖然許多開發中國家選擇了自由市場，但它們的成功往往是倚靠自主性的確立，認為東亞模式雖面臨金融危機而備受質疑，但從歷史變遷過程來看，國家自主性依然有其重要性，¹⁵而這也是本文主要的觀點，所以本文也將以動態分析的觀點，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或事件中以特定的或比較的個案研究，具體掌握國家能力的變化，¹⁶是否能取得發展政策的主導性。

二、歷史制度論

以往傳統制度主義都是以靜態的形式去討論機構或組織，而新制度主義則開始針對制度的動態性質做研究，也就是從制度的設計、建立到改變，是一套完整的思路，是從過去的制度理論中心去進行創新與修正。

¹⁴ 閻紀宇譯，Fukuyama 著，2005，《強國論》。台北：時報文化，頁 32-46。

¹⁵ Polidano C., 2001, "Don't Discard State Autonomy: Revisiting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pp.513-527.

¹⁶ 劉宜君，2007，〈全球化與國家財政職能的轉換〉，《競爭力評論》，第 4 期，頁 12。

而根據新制度理論分析脈絡、解釋偏好、形式上的不同，又可分為多種流派。學者 Peters Guy 將新制度論分成規範制度理論、理性選擇制度理論、歷史制度理論、社會學制度理論及結構制度理論五種。¹⁷而本文選擇歷史制度論的原因在於其可觀察宏觀、長期的歷史過程，可透過脈絡性的比較分析與個案研究，歸納、說明複雜的歷史過程。

歷史制度論在我們研究國家角色時，可以做為一個重要的途徑，是由於歷史制度主義注重具體的時空脈絡，並從時間序列來分析事件發生的過程與後果，將歷史因素中的時間拉長，進而分析行動者的行為，而本文也將以在不同時期領導者的執政之下，去探究台灣與南韓之間的相同點、相異點以及重要的轉折點。而歷史制度主義可以將每段的因果關係條列出來，將前事件與後事件之間串連起來，也就是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過程取向的途徑，也特別強調結構與行動間的相互關係。行為者的任何決策、偏好，也都會影響之後的路徑依賴；制度的建立可能是由於一個重要的偶發性事件，並且在之後還可以持續的適用，產生了制度增強機制；但也有可能只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而選擇的制度，到後來發現並不是最適合的，這些都需要觀察長時間的變化才可發現。

根據 Peter Hall 和 Taylor 的觀點，他們將歷史制度論分為以下四項特徵：一、從相對廣泛意義上界定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使用「計算途徑」與「文化途徑」，具體論述制度與行動的相互關係。二、強調在制度運作和產生過程中權力的不

¹⁷ Peters Guy, 1996,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ld and New,"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5-222.

對稱性。關注在各社會集團間不平等的權力分配方式，主張每個制度的形成必然會有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三、分析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過程時，強調路徑依賴與意外的後果。亦即行動者在不同的時間點所做出的決策，可能會受到偶發性事件的影響而產生改變，四、關注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後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進行研究。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度並非產生政治結果的唯一因素，關注在思想與觀念與制度的相互關係。¹⁸

從 Peter Hall 和 Taylor 在制度與行為的說明可發現兩個特色，一是制度與權力間的關係密切，制度架構很大一部分就是權力鬥爭的產物，二是在宏觀(文化/結構)與微觀(計算/行為者)之間，歷史制度論並沒有固定的立場，¹⁹採取中觀層次的分析方式，在分析上更具有彈性。

另外，在 Pierson and Skocpol 的文章中，將歷史制度論的特徵歸納為：關注重大的問題和令人疑惑的事件、注重時間的順序以及追尋歷史過程，以便對事件和行為做出解釋，²⁰也就是說，歷史制度論者的研都是在觀察一些歷時性的模式，不只是在觀察過去，而是在觀察一套歷時性的過程。

而一般歷史制度論者都會主要關注於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和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兩個類別上，而本文也將利用這兩個分析的類別，首先找出一個重要的事件，而建立出來的制度，且這個既有的狀態很有可能延續下去，因而產生路

¹⁸ Peter A. Hall and R.C.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pp. 936-957.

¹⁹ 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架構〉，《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3期，頁148。

²⁰ Pierson and Skocpol, 2006,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p.1-32.

徑依賴，而這也意味著有正向回饋的過程，最早被經濟學家稱為遞增報酬的過程，North 就找出科技與社會的共通性，認為規範社會需依靠制度，例如社會中最富有和組織完善的團體，會覺得維持現狀，對其自身最有利，因為人們想要高上的生活，而這是基於自利的考量，因此制度發展的過程也會有路徑依賴的特徵與正向回饋的作用，²¹而之後 Pierson 則將其轉向政治的領域，由政治領域中四個明顯的特徵，使得社會生活易於形成路徑依賴和遞增報酬的過程：第一，集體行動的主導作用，第二，制度的高度密集性，轉換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且政治人物有任期的限制，也導致政治人物不願意輕易去改變舊有制度，第三，運用政治權威提高權力的不對稱性，若已經是站在權力較高位置的人，當然不願意去改變舊制度，第四，內部的複雜性與不透明，這是因為決策過程中資訊通常是不透明的。²²

最後，關於時間序列的部分，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也是相當重要的，前事件會比後事件更為重要，因為後發生的事件很有可能會被先發生的事件影響所掩蓋，且行為者也有可能會故著於第一個所選擇的道路，不同的事件順序，會產生不同的歷史路徑，而當下行動者所做的選擇對於後續的歷史路徑，也應該具有決定性。²³

總之，以歷史制度論作為分析的觀點，強調的是制度為外部環境運作脈絡下的產物，並且也重視制度內部中某些較有權力之行為者的偏好。而本文主要運用在歷史制度論中，關鍵時刻、遞增報酬以及路徑依賴的觀點，由於行為者是可以產生想法的，行為者是有自主性的，可以去做出選擇，而一開始所選擇的制度，

²¹ Douglass C. North,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52.

²² Paul Pierson,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pp. 251-267.

²³ 同註 19，頁 160。

很可能是在某個關鍵時刻下偶然發生的事件，而之後想改變，其成本可能會很大，以及行為者在其中得到的報酬越來越多，因而在遞增報酬的機制下產生了的路徑依賴，去解釋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如何持續的存在，且一個舊制度已經是用長久，一旦想要改革必定會出現既得利益者之反抗，所以本文也將採用權力論與菁英論在這部分加以論述，並且在討論國家競爭力時，我們不能只單看一國的政府、經濟結構，也必須注意到國家、政府的功能與角色；但是，歷史制度主義強調的重點在於國家的結構而缺乏功能上的論述，所以，本文也將使用國家中心論來補足此點的不足。

三、權力菁英論

首先，我們先將權力與菁英分別做個定義，不論在任何時代，每個人都會有權力的慾望，而權力的定義也有很多種，如 Max Weber 將權力定義為：「在共同的行動裡，即使受到其他參與者的抵抗，一個人或一群人仍可以實現他(們)自身的意志」；²⁴ Lasswell 與 Kaplan 則把權力界定為參與社會價值分配的決策地位和機會。²⁵ 而人類不只要獲取權力，更想盡其所能的保持權力，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所用的方法就是透過選舉的結果，但領導者最後也有可能違法濫權或貪污而失去其正當性與民意，人類對權力的渴望，可能是基於權力本身的誘惑，也可能是由於權力的工具價值。²⁶

而菁英則是一個用於分類的、描述性的概念，指的是某一社會中佔據高級地位的人。²⁷ 在傳統上，菁英是由具有優異統治能力的人所組成，他們有統治意願並且應該統治，也可以是由某一

²⁴ 林庭瑤譯，Kate Nash 著，《全球化、政治與權力》。台北：韋伯，頁 1。

²⁵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²⁶ 呂亞力，2008，《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台北：東華，頁 3。

²⁷ 劉北成、許虹編譯，帕累托等著，《菁英的興衰》。台北：桂冠，頁 149。

政治共同體的掌權者所組成，掌權者包括領袖層，和在一個特定的年代主要領袖的社會階層，這一階層被要求負起責任。²⁸所以，權力菁英就是指社會上少數擁有政治權力、享有龐大資源並參與決策的人。²⁹

然而，即使是在一個健全的制度下依然會存在著上層的腐敗者，所以當制度腐化，在裡面生活和工作的人也必然會腐化，而金錢生活的追求是一個凌駕一切的價值，所以，當政治菁英在追求金錢和財產累積的過程中必然會變得殘忍無情，³⁰這在台灣與南韓的政治中也不難發現，南韓更有多位領導者因貪汙案而下台。

整理以上論述，本文將使用歷史制度論以宏觀的觀點找出在歷史上偶發性事件的關鍵時刻之下，行為者所選擇的制度並很可能執著於一開始所選擇的制度，因為行為者得到的利益逐漸增加，而有了所謂遞增報酬的過程之下產生的路徑依賴，運用此概念來探討台灣與南韓政經體制的持續與轉變的過程，再以國家中心論中國家自主性與政府主導的概念，分析在遭遇全球化以及重大事件時，國家自主性的增強或減弱，進而影響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導致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或下降，最後，以權力論與菁英論在微觀的層次上，加以分析少數擁有權力的政治菁英或在舊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與後來期望改革者之間權力的角逐，會影響著政府在政策的制訂與執行上。

²⁸ 同上註，頁 161。

²⁹ 同註 26，頁 85。

³⁰ 王逸舟譯，米爾斯著，《權力菁英》。台北：桂冠，頁 433。

貳、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依循著歷史的時間序列來做論述的基礎，因此本文將採取「歷史研究法」在加上取得資料時所使用的「次級資料分析法」，作為在探討本文相關事件時與論述的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用來研究過去的事件或所發生的事情的一種方法，可以用來了解過去的制度，尋求一些因果關係，並且做一個有系統的探討，同時也重視政治解釋中的時序因素，所以在解釋某事件發生時，特別強調事件持續的時間以及重要歷史事件的時機，而此研究法可運用於本文，將採納以發生的歷史紀錄，了解過去台灣與南韓遇到關鍵時刻或危機時，國家、政府、領導人、經濟結構之間關係的變化，再釐清當前所發生之事件的始末，以找出其共通點，做一個來龍去脈的瞭解，特別是在本文討論不同時期之執政者所實施之政策方向，更可以瞭解在關鍵時刻發生時，前後之兩位領導人所做之應變，進而預測其未來的發展。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

主要方法是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做進一步的分析，利用現有相關文獻加以探討，進而希望可以找出還未研究之問題已及再重新整理獲取新的概念，以顯示出研究議題的意義內涵，並藉此建立研究的可信度、經由先前之研究，瞭解其研究過程與方法，再加以探索、整合併摘要已知的領域、從過去的研究中學習，試圖發現新的理念。³¹

³¹ 王佳煌、潘中道等譯，W. Lawrence Neuman 著，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頁754。

而使用此種方法是由於研究上的限制，無法使用第一手實地訪談的資料，所以本文也將大量的蒐集台灣與南韓政治經濟發展、改革，以及國家競爭力研究之相關文獻，以及藉由我國官方與國際各學術研究機構所發表的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研析台灣與南韓處理金融危機之經驗與因應機制，並針對兩國近二十年來領導人處理危機的做法，再經過整理、相互比較，最後做出解釋，也希望藉此發現更多相關研究上的問題。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分析

在文獻分析的這一部分，本文將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有關台灣與南韓相關之政經發展與改革的文章；第二部分則是關於國家發展與國家競爭力之探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好壞必定會影響著國家的競爭力，而許多學者的研究中也發現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有著強烈的關係，所以本節也將循著這一脈絡進行分析。

壹、台灣與南韓政治與經濟發展之探討

在政治與經濟面向上的討論，本文將先從研究有關政治民主化過程的學者開始分析，並說明政治與經濟間的互動過程，以及經濟的自由化與全球化對國家機關的影響，並從中找出運用於本文的觀點。

一、政治面

國內討論關於台灣與南韓政治經濟的文章相當的多，而在討

論的著眼點上也有所不同，在 1980 年代以前學者大多以「發展型國家」的概念以及政府主導的特性，來研究台灣與南韓的發展模式。但隨著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許多學者的關注焦點也逐漸轉移，並且台灣與南韓也都在 1980 年代以後發生了許多的民主運動，所以在政治面向上本文首先探討關於民主化的研究，並將其焦點放在政體由威權轉變為民主的討論上。

首先，在形成威權體制的研究上，Cumings 他在 1984 年的一篇文章中，透過「核心-半邊陲-邊陲」的世界分工體系，將美國、日本、南韓與台灣納入其中，並以美國做為一個核心國家，日本為半邊陲，而美國為了要有效的運用台灣與南韓的政經資源，導致了兩國都形成了官僚威權的政體。³²也可以說，台灣與南韓會形成威權的體制，是美國霸權規畫戰後東亞政經體系分工下的結果。³³蕭全政(1995)則將威權體制界定為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的一種控制與支配關係，³⁴在政治上剝奪與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參政權；在經濟上則管制與操控著經濟活動與市場行為；而台灣在 1987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時，也逐漸朝著民主政體邁進。

其次，Huntington 認為現代政治歷史上總共出現三次民主化浪潮。³⁵每一波發生的時間原因與過程都有個別的差異性，這與當時的內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他也嘗試去說明事什麼原因造成在 1970 到 1980 年代有著一股民主化的浪潮，提出民主化的因素不只因地而異，也會因時而異；並且也有許多的研究認為經濟發展和民主之間是有關連性的，Lipset 則說明了經濟發展及正當性與民主的穩定有關，社會環境會影響民主化，特別是經濟發展

³² Bruce Cumings,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1, pp.1-40.

³³ 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頁 72。

³⁴ 蕭全政，1995，《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台北：時英，頁 8。

³⁵ Samuel P. Huntington, 2007, "Extract from the Third Wave," *Democracy*, NY: Routledge, Ch41.

與富裕，即「越富裕的國家，越可能產生民主」；³⁶但 Valerie Bunce 則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程度對民主存在與否已沒那麼相關，重要的是民主的維持，³⁷即貧窮國家的民主也可以跟富裕的國家一樣好，只是在高經濟發展的國家中，維持民主的可能性較高。

另外，在民主轉型的研究上 C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ance Whitehead(1986)則強調在民主轉型的階段，政治行為者關鍵選擇的重要性，而不探討民主化的成因；而 Graeme Grill 則列出了導致威權體制瓦解的原因，其中包含了經濟危機、政治動員、國際壓力等因素，³⁸這也可以運用在台灣與南韓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倪炎元(1995)在台灣與南韓民主化的比較上則以策略互動與制度分析為主，比較了台灣與南韓威權政體之轉型，其認為一個政體之所以會發生轉型，是基於與其政體相關或相互依存的結構條件發生變動所致，深植於其所處歷史與國際政經的情境脈絡中。³⁹孫同文(2003)則從全球化與威權轉型的角度切入，去分析台灣國家機關所面臨的強烈衝擊，以及其所作出的回應，著重在行政革新和府際關係的改變上。⁴⁰

而其中有別於從「威權政體轉變成民主政體」探討的則是，黃長玲(2008)在其「分裂社會下的體制發展與爭議：台灣與南韓民主化經驗的比較」文章中討論了台灣與南韓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格局以及相關體制性的問題，⁴¹而這也是本文所關注的焦

³⁶ Vanhanen Tatu, 2003,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ountries*. NY: Routledge, Ch1.

³⁷ Bunce Valerie, 2000,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In Alan S. Zuckerman(ed)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documents*, Vol. 2, pp.364-392.

³⁸ Vanhanen Tatu, 2003,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ountries*. NY: Routledge. Ch1.

³⁹ 同註 32，頁 4。

⁴⁰ 孫同文，2003，《從威權政府到民主治理》。台北：元照，頁 21。

⁴¹ 彭慧鸞，2008，《番薯與泡菜：亞洲雙龍台韓經驗比較》。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頁 44。

點之一，而分裂社會的問題也是台韓民主化中的重要元素，這與國家認同有著密切的關係，蕭新煌與朴允哲(2008)在「宏觀歷史與社會政治轉型-台灣與南韓國家認同之比較」一文中則從宏觀歷史與當代社會政治轉型的角度，比較台灣與南韓在國家認同的本質上差異，以及中國與北韓在其中的影響，⁴²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雖然外在環境有中國的威脅以及在內部有國家認同的問題，但至今仍然可以說是維持著自由與開放的道路發展。

最後，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an 則探討了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達成民主，並且他們著重在政治的要素上，特別是國家強大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領導者的決策，他們提出鞏固民主的五個領域，包含了社會、政治、法律、國家以及經濟，且這些項目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必須要有其他領域的支持，這五個領域缺一不可且相互支援，⁴³並且認為雖然國家採行計畫經濟，則政治社會的相對自主性就會消失，但因為沒有純粹的市場自由，所以在民主鞏固之中，一定都會有著高度的市場干預，如果國家喪失了能力，無法進行任何的管制措施，則會對現有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並且台灣與南韓的政經發展開始出現明顯的差異，就是在民主轉型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所以接著將討論到經濟面向的部分。

二、經濟面

由於經濟的全球化導致國家決策者的主權受到了侵蝕，關於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 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當中所關注的議題在於政治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會如何的影響社會的繁榮，這也使得整個十九世紀

⁴² 同上註，頁 12。

⁴³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3-15.

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但這個觀點在馬歇爾(1890)的「經濟學原則」將政治經濟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領域後，使得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政治與經濟的討論是分開的。⁴⁴

直到二十世紀後期，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影響只能解釋到片面的經濟行為，使得一些經濟學者重新思考政治的角色，在加上冷戰時期，學者也開始思考政治與經濟間的關聯，並且有了經濟成長促進政治穩定與民主政治的結論，現代化理論因而產生，但實際上第三世界國家卻因為快速的現代化導致了政治不穩定的情況，為解釋此現象依賴理論於是誕生，依賴理論是源於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描述，即北半球國家的資本主義成功的滲透到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國家，使這些國家的經濟被推到現代產業中，⁴⁵但此理論從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情況來看並不適用，因為即使在當時資源缺乏這些國家依然可以參與世界經濟與提升生活水平，而後 Chalmers Johnson 則在 1982 年的日本政經發展研究文章中，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模式，來解釋戰後東亞國家(特別指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⁴⁶

Woo-Cumings 在「The Developmental State」一文中，即是透過發展型國家模式來解釋東亞地區各國在政經體制轉型與發展之成就，並以此說明這些國家機關(政治)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動員企業團體(經濟)，以調整出有效率的政經合作模式，以面對來自世界局勢的挑戰。⁴⁷

⁴⁴ Anthony Gill, 2002,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n Wirida Howard J(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p.81-102.

⁴⁵ Tony Smith, 2002, "The Dependency Approach," In Wirida Howard J(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p.45-62.

⁴⁶ Johnson Chalmers, 1999,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Meredith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2-60.

⁴⁷ Woo-Cumings, Meredith,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 State*, pp. 1-31.

在對於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安士敦(1989)提出了與自由市場不同的論點，並以南韓為研究對象，認為南韓並不是依靠自由化下的市場機制成功發展的，第一，之所以有落後國家是因為它們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機器來領導；第二，自由化對經濟發展不一定有效，落後的國家是需要政府大力支持的，⁴⁸而這也與本文用來解釋台灣與南韓經濟發展所需的國家能力與政府主導性相互呼應。

但發展型國家模式則在 1990 年代遭受到全球化的挑戰，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則在這個背景之下，以台灣為例，描繪出發展型國家努力超越發展的面貌，試圖回答當後進國家建立基礎工業經濟之後，已經無法以低廉工資、出口導向或是國家干預等等策略取勝時，如何在世界上持續競爭，因此提出了政府和企業的分工模式，建立了後進發展的模式。⁴⁹蔡增家(2005)則比較了台灣與南韓政府在管制、自由化、再管制政策的實施過程，也說明雖然兩國曾經有過類似的管制與自由化經驗，但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加大了兩國的落差。⁵⁰吳家興(2005)在其書中也討論了南韓在 1980 年代以來經濟政策轉變之成果，也分析了南韓爆發金融危機之原因與影響，說明南韓如何從危機中化為轉機。⁵¹分析上述學者的文獻之後，我們可以得知台灣與南韓都是先以國家領導的模式發展經濟，但是卻也發現發展型國家到了後期，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將會與國家發生主客異位的問題，所以在此模式之下國家的角色該如何定位？是領導者還是後起者？亦或是兼顧領導者與後起者之角色？而這也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⁴⁸ Alice H.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6.

⁴⁹ 瞿宛文，安士敦著，朱道凱譯，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頁 1。

⁵⁰ 蔡增家，2005，〈管制、自由化與再管制：2000 年之後台灣與南韓政經轉型的比較〉，《中政會論文》，頁 1-23。

⁵¹ 吳家興，2005，《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頁 4。

貳、國家競爭力之相關探討

研究關於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最著名的代表是 Michael Porter(1990)，他引進的鑽石體系後來也成為世界經濟論壇(WEF)用來評估國家競爭力指標的基礎。根據 Porter 的觀點，認為若從國家的層面來考量時，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⁵²而所謂的鑽石體系則是由四大要素所構成：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以及企業的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⁵³而政府的角色則是必須提供生產的要件，這也將影響一個國家其產業的競爭優勢。Porter 也認為政府對於經濟的發展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許多國家也都忽略政府應該扮演著積極性角色，而只是努力縮小政府的干預，但政府應該要制定適當的規則，以及從事有利於增加生產力的公共投資。⁵⁴

而所謂國家競爭力則是在 1980 年代之後開始受到注目，然而要如何找出一國的競爭力，目前在國際上有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論壇、英國經濟學人中心、世界銀行的「治理與反貪專案」以及環境永續指數等對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進行評比的機制。而其中又以 IMD、WEF 的競爭力評比最受國際的矚目，⁵⁵本文也將主要採用 IMD 與 WEF 的評比結果做為參考。而在國內對於競爭力之定義與評估也有許多相關的研究。承立平(1996)在文章中依照 IMD 的競爭力內涵檢視競爭力之理念，解說提升國家競爭力之條件，其國家競爭力之六大要素，包含了社會經濟模式、資產與資產創造過程、吸引力與積極性、全球性與親和性、新增

⁵² 李明軒、邱如美譯，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頁 11。

⁵³ 同上註，頁 105。

⁵⁴ Porter Michael E. et al, 200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4-2005.

⁵⁵ 朱景鵬，2009，〈從國際競爭力評比析論政府效能提升之道〉，《研考雙月刊》，第 33 卷第 2 期，頁 20。

加的價值以及國家財富。⁵⁶薛立敏(1997)則區分了 WEF 與 IMD 理論上與方法上的差異，而兩者對於國家競爭力之要素主要的差異在於，WEF 的因素不包括國內經濟表現，認為競爭力指標就是要用來衡量一個國家五到十年內的經濟成長潛力，所以自然不包括在內，因此 WEF 也多增加了社會與政治制度這一項因素。⁵⁷而朱景鵬(2009)認為台灣在政府效能的面向是較為弱勢的，在文章最後則提到對國家競爭力之評比，是以開放、透明、最小干預、自由經濟等原則所設計的，但是我們也需注意到本國需要、民情與發展進程。

而政府又要如何幫助國家競爭？詹中原(1998)也談到了台灣在 1996 到 1997 年之間，在「政府職能」指標上的表現，大幅的退步，並且經由美國、英國及紐西蘭各國之政府再造分析，發現了以下五點：一、學術與實務之知識應用現象；二、財政部門涉入；三、領導者之決心；四、公私部門合作；五、立法與行政之再造共識等五項特點，值得作為我國政府再造的參考。⁵⁸Richard H.K.(2007)使用競爭來表達國家在世界經濟爭奪市場佔有率、外人投資和出口銷售，政府要必須從許多基本方面來領導這場競爭，並且運用策略、結構、資源以及政府四個面向，彼此互補、相互配合，將有成功的經濟成長與競爭優勢。⁵⁹本文也將採用此觀點分析台灣與南韓之政治經濟發展，在過程中是否會因為使用了無效的策略或是不適合的結構，而阻礙了成長，降低了競爭力。

⁵⁶ 承立平，1996，〈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基礎與基礎建設〉，《經濟前瞻》，第 48 期，頁 44。

⁵⁷ 薛立敏，1997，〈WEF、IMD 對國家競爭力的衡量有何不同〉，《經濟前瞻》，第 52 期，頁 91。

⁵⁸ 詹中原，1998，〈國家競爭力與企業政府精神〉，《研考雙月刊》，頁 6-18。

⁵⁹ 李隆生、張逸安譯，理查·維特著，2007，《國家競爭力》。台北：聯經，頁 1-24。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限制

壹、研究架構

基本上，本文將以年代做為論述的主軸，並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到 2010 年做一個全面性的比較台灣與南韓兩國政經體制的轉變，南韓與台灣都先後在 1980 年代之後受到民主化、自由化的影響，制度產生變化，並且兩國也都在之後分別遭受到國際環境的衝擊與國內政治上的轉變，因此，本文將主要分成三個時間點，首先我們將會看到第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1997 年南韓出現的政黨輪替，並且同一年也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而南韓也在金大中的改革之下，使得經濟成長受到了全球的矚目；其次，第二個關鍵時間點是 2000 年台灣也出現了首次的政黨輪替，但台灣卻在陳水扁的執政領導之下，政治的格局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而這是否也導致了日後台灣經濟發展低落；最後，第三個關鍵的時間點則是 2008 年的世界金融海嘯，並且台灣與南韓也出現了的政黨輪替，在內外環境都不利的情況下，台灣與南韓要如何找出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可以將三個關鍵時間點做一個簡單的分類，見表 1-1。

表 1-1：台灣與南韓政經改革之關鍵時刻

國家	台灣	南韓
時間、事件		
1997 亞洲金融風暴 南韓政黨輪替	外在環境衝擊	外在環境衝擊 國內政治轉變
2000 台灣政黨輪替	國內政治轉變	
2008 世界金融海嘯 台韓政黨輪替	外在環境衝擊 國內政治轉變	外在環境衝擊 國內政治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依照表 1-1 的分類，可以進一步的說明本文的基本假設是當國家遭受外在環境衝擊或是國內政治轉變，導致政府政策、經濟結構以及領導人又無法做出有效的因應措施，因而影響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失去競爭力，可見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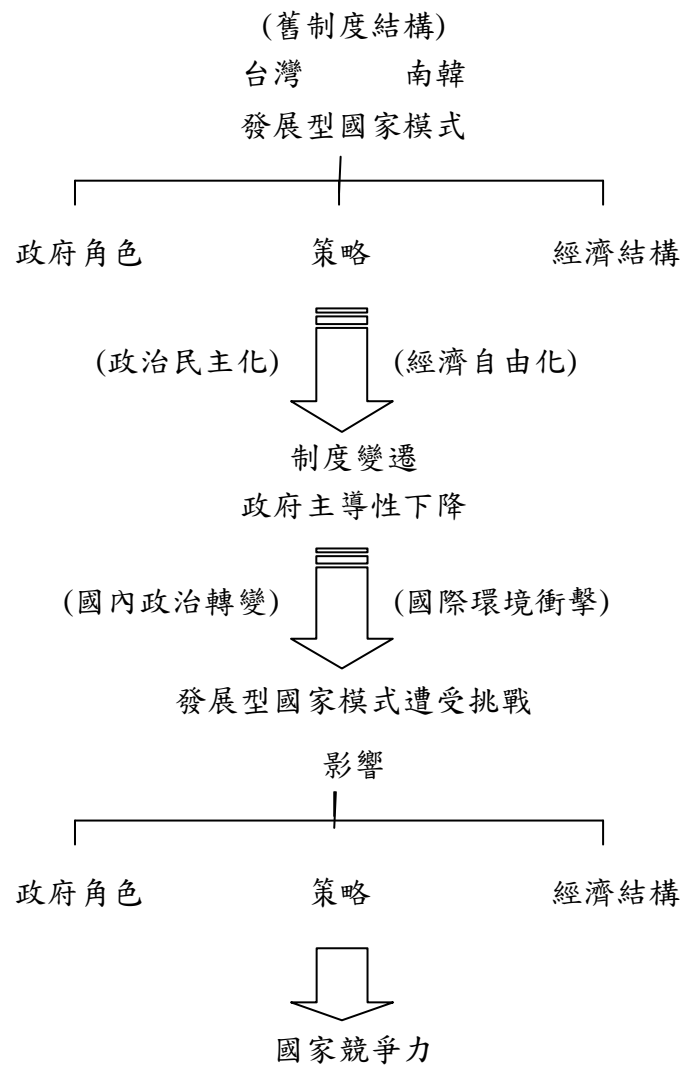


圖 1-1：本文主要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總之本文的研究架構是以台灣與南韓兩國歷屆總統在執政時期所實施的政策以及改革的方案，是否有達成經濟發展之目的以及在遭遇危機時關鍵時刻領導人的反應與政府的角色，是否可以幫助國家提昇其競爭力，文中再分為政治面與經濟面之間進行相互的論述，最後再找出兩國家競爭的優勢，做一種新的分析視角。

貳、研究限制

最後，本文在研究限制方面，首先在於語言方面，對於以韓文為主的資料，學生無法閱讀，所以只能採納英文與中文方面的書籍與文章；其次，由於時間與經濟上的限制，故學生無法對政治菁英做深度訪談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只能使用報紙或期刊，作二手資料的分析；並且由於國內外研究台灣與南韓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書籍、文章數量非常多，因此在文獻回顧時難免會有疏漏之處，也只能選擇其中較具代表性之文章；再者，本文的焦點在於台灣與韓國的政治與經濟面，所以在社會面向上將無法做一個完整的分析，另外本文的重點在於國內政治的轉變與經濟的改革，且關鍵在於亞洲金融風暴、兩國的政黨輪替以及世界金融海嘯，所以沒有針對其他可能之因素再加以比較討論；最後，關於本論文之相關議題，會遇到正在進行或是未來遇到國內外情勢的變化可能在研究上無法做出最完善的解釋，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從 1988 年到 2010 年之間台灣與南韓兩國在政治與經濟上改革的過程做為討論的範圍。

第二章 1988-2008 年台灣政經改革

在這一部分開始，本文將會以台灣與南韓兩國在 1980 年代後期之總統所實施的政策做為比較之基礎，並且以 1997 亞洲金融風暴、南韓政黨的輪替以及 2000 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與 2008 年世界金融海嘯、台韓政黨輪替三個個別以及共同的關鍵時刻，加以論述改革之原因與過程。在此時期的政治面上，台灣與南韓兩國也都各自從威權轉型到民主，然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兩國仍然存在著一些根本的差異；在經濟方面，台灣與南韓兩國政府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干預市場，並且可以發現在民主轉型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台灣與南韓的政經發展有了明顯的落差。總之在 1980 年代後期，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已經是全球主要的趨勢，台灣與南韓當然也順應此潮流，積極的推動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而在轉變的過程中兩國分別又會遭遇到哪些阻礙與挑戰？又會對國家造成什麼影響？以下本文將先論述 1980 年代後期的國際情勢與台韓兩國之威權政體形成之背景做一個說明，接著再分別討論台灣與南韓歷任總統所做之政治與經濟改革。

第一節 威權政體之歷史背景

1980 年代，世界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美蘇兩大強國的國際影響力日漸消退，並且在 1991 年蘇聯內部政局改變，也改變了國際體系的面貌，共產黨的政權正式的落幕，各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使得蘇聯走入歷史，成立俄羅斯共和國，但國力大不如前，導致兩極體系的結構面臨轉型的挑戰，美國也因此拉大了與其他國家相對的競爭優勢，並且在 1980 年代末期日本也發生了結構性泡沫危機，德國也受到 1990 年完成統一後的財政壓力負擔，

致使國際結構逐漸傾向於單極的特性，⁶⁰與此同時，美國也為了應付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尤其是與歐盟之間，因此，東亞的戰略地位也越顯重要，在此架構下，台灣與南韓也得到了美國霸權所有的好處，經濟也得以快速的發展。

由於戰後國際政治的演變，使得美國在東亞的戰略設計是以美國為中心，日本為半邊陲，東亞為邊陲之方式。⁶¹Cumings 透過此種世界分工的體系，將美國、日本、南韓與台灣納入一種分析架構中，以美國做為一個核心國家，之配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關係的範圍，在此範圍內的國家被整合在一個有一定政治經濟偏好的組合中，⁶²而在韓戰以後南韓與台灣則一起被包含在日本與世界的經濟中，美國則積極介入亞洲事務，對台灣與南韓提供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支援，並協助兩國政府推動農地改革，同時也是為了避免中國在亞洲的勢力擴展太快，所以美國對於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包括了促進政治穩定，保持經貿利益之接觸，並且美國霸權也不像舊帝國主義以佔領土地的方式，在加上主張自由貿易的方式，無法避免在競爭中對其本國經濟的損害，使得台灣與南韓有向上流動之機會，⁶³不只是獲得大量的美援，也使得落後的工業加速起步，成為新興工業國家，邁向下一階段國際化、自由化的經濟體制，並且 Cumings 也認為美國為了要有效的運用政經結合的力量，在世界的市場中追求利益，也造成了台灣與南韓官僚威權體制的形成，政府對於經濟有著強大的控制力，有著高度的組織連繫，和異於特殊利益團體的特性。⁶⁴

⁶⁰ 蔡東杰，2008，〈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及其戰略布局〉，《東亞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179。

⁶¹ Bruce Cumings,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1, pp.1-40.

⁶² 同註 32，頁 72。

⁶³ 彭懷恩，1995，《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頁 234。

⁶⁴ 同註 60，pp.1-40.

台灣與南韓兩國都分別在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建立了威權政體，但卻有著不同的形成背景，南韓可以說是與第三世界多數威權政體類似，是透過軍事政變後建立的；而台灣則是先在中國發展成型的準黨國體制，移植到台灣後建立的，⁶⁵台灣與南韓都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並且絕對權威的政治領袖，但是卻有著不同權力的來源，在台灣的準黨國威權政體中，國民黨幾乎全面壟斷與之配著國家機關，並滲透到行政部門與政策制定上；而南韓的軍人官僚政體中，有關政策決議等事項完全是由國家機關的行政部門所壟斷，政黨並不發揮聯繫的功能，⁶⁶而這些兩國在組織結構與制度設計上，以及政府的支配與控制機制的差異，也間接影響到了台灣與南韓在 1980 年代之後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以下將先從台灣 1980 年代之後執政者的政經改革開始論述。

第二節 李登輝時期(1988-2000)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所實施的是政黨二元體系的政治結構，也就是國民黨組織與國家正式組織形成的雙重結構，此威權政治歷經了將近四十年。1975 年蔣介石逝世，由其子蔣經國接棒，開啟了台灣的改革，1978 年蔣經國被國民大會選為總統，但一直到蔣經國總統晚年開始推動的民主改革才有所變化，在其任內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改革。⁶⁷而真正的落實政治改革的目標則是在繼任的李登輝身上，1987 年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1988 年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當時權力交替的過程大致上順利的完成，李登輝為中華民國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整個社會也因此對立登輝有高度得期望，希望其能有大幅度的改革。

⁶⁵ 同註 32，頁 77。

⁶⁶ 同註 32，頁 133。

⁶⁷ 同註 62，頁 209。

而此時的台灣正面臨除了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壓力，還有來自黨內嚴重的衝突與分裂，然而原本的威權體制並無法做有效且快速的調整，導致國家能力下降以及經濟失衡的現象；並且與此同時在 1990 年代全球的經濟也出現意外的轉變，諸如日本經濟泡沫化、美國股價創下新高、西歐國家快速的整合，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的發展，也成為了世界主要貿易國之一，⁶⁸東南亞的經貿也逐漸崛起，使得台灣大量外資轉移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因此削弱了政府汲取財政的功能。⁶⁹此時台灣的國家角色正面臨著來自國際經濟與國內社會勢力崛起，政治和經濟上的危機導致國家能力衰落之問題。

壹、政治改革

1980 年代末期，台灣開始了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國家，在政治方面，李登輝在任內初期首先面臨到的是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分裂問題，國家能力明顯下降。因此李登輝變企圖透過拉攏因民主化而逐漸強大的社會力量，來對抗國家內部的舊有勢力，藉此達成鞏固其政權與地位的目的。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在一場中外記者會表示：「將在一年內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兩年內完成憲政改革」，⁷⁰同時李登輝也欲維護其政權並加強國家自主性，所以在李登輝的執政時期主要是透過六次的修憲來進行整體的改革。另外，李登輝也強調在「務實外交」上的重要性，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的成效，以下將分別就這兩點做討論。

⁶⁸ 同上註，頁 243。

⁶⁹ 林義鈞，2005，《台灣國家能力與國家認同之關係》。台北：秀威，頁 3。

⁷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編著，1992，《以民意修憲向歷史負責》。台北：中央文物。

一、憲政改革

從 1991 年開始李登輝逐步以修憲的方式將民主化落實到憲法，帶動了實質的憲法變遷，⁷¹其主要改革的包括國民大會、立法院等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問題以及總統、副總統改為由人民直接選舉之方式產生，大多集中在中央政府體制的調整方面，⁷²具體而言，自八〇年代以來，廢除「萬年國會」，推動國會改選，一直是台灣本土反對勢力改革的首要目標，由資深代表所組成的國民大會於是在 1991 年的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中明定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由台灣地區的人民重新選出中央民意代表，以解決國會正當性的問題。⁷³而 1992 年第二次修憲與 1994 年第三次修憲主要的內容都是擴大總統權力，解決總統產生的方式，因為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所以建立由公民投票的總統選舉方式，無法在第二次修憲中完成，因此第三次修憲則是為了完成總統選舉方式的改革，另外，第二次的修憲也實現了省長與直轄市長民選的改革聲浪，大致上前三次的修憲為國民黨解決了對內代表性的危機，也凝聚了台灣人民的主權意識。⁷⁴

1997 年第四次修憲主要的內容為「精省」，也是中央政府體制較大幅度的調整，如廢除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覆議案門檻降低、設置總統被動解散國會權等等。⁷⁵此次修憲也讓我國憲法從帶有濃厚內閣制的色彩，轉為雙首長制。1999 年第五次修憲主要為國會改革，使國代與立委任期相同，同一時間改選，延長了國代的任期，為此輿論抨擊有「自肥」之嫌，立委也有所不滿，提案申請釋憲，最終大法官於 2000 年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此修憲

⁷¹ 葉俊榮，2003，《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北：元照，頁 23。

⁷² 吳重禮、吳玉山主編，2006，《憲政改革-背景、運作與影響》。台北：五南，頁 75。

⁷³ 同註 70，頁 33。

⁷⁴ 同註 70，頁 34。

⁷⁵ 同註 71，頁 76。

延任「有違選民有限委託」，應屬無效，因此第五次的修憲也已作廢。⁷⁶2000年第六次修憲也是關於國民大會體制的改革，將國民大會改為「任務型國大」，只有在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或對正副總統之彈劾案時，才能依政黨比例選出代表三百人，並限期一個月內完成決議事項，任務完成後，即解散，這使得國代虛級化，其原有之權限移轉到立法院，也因此立法院擁有了現代民主國家國會的主要權限；⁷⁷下表 2-1 為六次修憲重要內容的整理。

從六次修憲的結果可以發現，首先，總統由人民直選之方式，削弱了中國在台灣象徵意義；其次，是總統權力的擴大，並可透過行政院長任命權，主導國家政策，但憲法本文中「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沒有改變，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之不合理體制，憲政亂象頻頻發生，⁷⁸也導致日後繼任之陳水扁總統，獨攬大權之現象；再者，轉型後的國家機關與台籍的政治菁英密切結合，使得國家必須在兩岸關係與國際上取得更明確的定位，才能保障其能力的來源與取得；⁷⁹最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卻也造成了國民黨日後分化的危機，也使得在野的民進黨有取得執政的機會。

⁷⁶ 楊日青，2006，〈憲政之困境與出路〉，《台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4期，頁103-123。

⁷⁷ 同註70，頁37。

⁷⁸ 同註75，頁103-123。

⁷⁹ 同註68，頁4。

表 2-1：六次修憲之主要內容

	時間	內容
第一次修憲	1991	1 終結第一屆資深民代，中央民代全面改選 2 賦予總統緊急命令的權力 3 制定國安三法，使國安會、國安局、人行局地位合法化 4 明定兩岸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第二次修憲	1992	1 總統、副總統改為由人民直選，任期四年 2 彌補國大失去選舉總統之權，使國大有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行使同意權 3 使國大常設化
第三次修憲	1994	與第二次修憲主要內容相同，仍為擴大總統權力
第四次修憲	1997	1 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 2 精簡省級政府，使省虛級化 3 立法院可以對行政院長提不信任案，通過後總統經諮詢立法院長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第五次修憲	1999	使國代與立委任期相同，皆為四年，同時改選
第六次修憲	2000	1 國民大會改為任務型國大，任務完成即解散，國民大會有名無實 2 副總統缺位時，由立法院補選 3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由立法院提出後再經人民投票同意通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務實外交

1979 年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邦交，李登輝為了除去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這個外交上重大阻力的歷史理念，主張中華民國必須接受無法在中國行使治權的事實，並在 1991 年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條款，表示不在視中共為一叛亂團體，但李登輝也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權力與其他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確立了務實外交的重要理念。⁸⁰

至於在推動務實外交的策略上，主要包含了加強與邦交國的雙邊關係、拓展與提升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以及積極的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⁸¹在經過了十二年積極的推動務實外交，使得台灣也維持了一定數目的邦交國，也確實的提升無邦交國間的實質關係，並且也成功的參與了許多國際組織，如亞太經濟合作會等等；但不論是爭取邦交國或是參與國際組織，都需要龐大的經費，因此也引起了輿論的批評，認為政府不當運用外交經費，而有了「金錢外交」名稱，這也造成往後政府在外交事務上的爭議不斷，此情形到了日後繼任的陳水扁政府有擴大的趨勢。

貳、經濟改革

在經濟方面，由於 1980 年代以來的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使得政府的能力受到影響，政府沒有做一個有效的調整，也無法像從前一樣的干預市場，發展型國家模式受到了挑戰，所以政府遂改以自由開放的態度面對停滯的經濟發展，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衝擊了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成長，造成景氣低迷，國內市場

⁸⁰ 張啟雄編，2002，《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頁 150-151。

⁸¹ 同上註，頁 157。

萎縮，同時金融風暴的危機也衝擊了許多的企業，此時的政府正面臨著巨大的考驗，為此其主要改革重點為以下幾點：

一、公營事業民營化

受到國際上自由化浪潮的影響，在 1987 年解嚴之後，政府便希望能取消公營事業的獨佔權，減少政府的干預，也希望藉此提高公營事業的效率，因此在 1989 年政府成立了「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開起了民營化政策的過程，並研擬開放證券商、保險業、銀行、通訊業等等，如 1989 年開放美國保險公司來台，1992 年十五家新銀行成立，1994 年開放新設票券公司，1996 年開始電信自由化等。⁸²從 1989 年到 1999 年底這段期間，完成轉為民營的共有二十一家事業與台機三座工廠。⁸³

二、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之政策

所謂 BOT 就是公共建設改由民營企業去執行，希望提高效率，也可為政府省去財政負擔，政府於 1994 年通過「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1995 年行政院核定「以 BOT 方式推動國內公共建設」方案，列管高鐵等二十二項 BOT 示範計畫。1998 年行政院通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建立公開、透明與責任化招商制度。2000 年 2 月，立法院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用以達成 BOT 政策目標。⁸⁴但 BOT 卻也存在著金錢與權力掛勾的問題，不但有可能無法汲取高效率好處，也無法避免綁標、圍標、經費浮濫、施工品質不當等弊端等等問題，⁸⁵所以在實施此政策之前，必須要有運作完善的政府，才能

⁸² 瞿宛文，2004，〈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3 期，頁 29-59。

⁸³ 林文程編，2000，《李總統執政十二年與台灣成就》。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頁 69。

⁸⁴ 同上註，頁 72-73。

⁸⁵ 周育仁，2007，〈民進黨政府治理之政治經濟分析--以 BOT 為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獲得民營化的好處。

三、國內產業政策升級

八〇年代台灣產業面臨到了挑戰，政府為了因應國內外環境的壓力以及強化產業競爭力，便開始重視台灣的產業升級，利用「自由經濟化為經，產業升級為緯」的理念來面對挑戰，在此理念下亞太營運中心被政府視為首要施政目標與跨世紀工程，以吸引跨國企業來台投資以及強化產業網絡；⁸⁶政府也在1990年推動「獎勵投資條例」的修正，並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取代，在國際化與自由化的壓力下，透過放鬆、解除管制來促進經濟成長。

四、兩稅合一

所謂兩稅合一，簡而言之，就是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合一，目的是兩稅合一可避免重複課稅，促成稅制合理化，但在當時有人認為兩稅合一可能會造成稅收龐大的損失，稅務機關因此不敢貿然實施，而之後為展現實施此政策的決心，李登輝便指示成立「賦稅革新小組」，1997年兩稅合一方案正式出爐，進行宣導一年，最後於1998年正式實施兩稅合一制度。

五、南進政策

李登輝總統南向政策主要執行者為經建會主委江丙坤所提出，南向政策為台商前進東南亞打下基礎，希望東南亞各國高層與我國之間已建立直接且穩定的友好關係，並且為台灣推動務實外交，打開東南亞近鄰之門，同時為台商在增加東南亞投資，也為台商創造外銷市場。

⁸⁶ 王建全，1996，〈新政府須強化台灣產業升級競爭力〉，《經濟前瞻》，第45期，頁54-61。

上述這些改革雖然使得台灣在 1990 年代中期經濟有逐漸回升的現象，資金的流動和價格也大多依照市場供需決定，金融服務品質和存放款利差也有相當大的改善，但也有一些在自由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如金融監理制度的問題，政府在追求穩定、自由化以及國際化的同時，未能注意到國內長存已久的金融問題導致金融弊案連連，也擴及到票券業和一般銀行。⁸⁷而過度自由化的結果也導致政府無法控制大企業，於是企業開始介入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而擁有龐大經濟資源的企業界則可能會透過政治獻金的方式，去影響政治菁英的決策過程，這也是金錢政治的開端，使得政府與企業間的政商關係更加緊密，另外政府積極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也形成企業逐漸被財團所獨佔，而這些種種自由化的政策也是引發金融危機之主要原因。

整體而言，李登輝時期所執行之六次修憲雖然確實提升了政府的國家能力，也漸漸的將台灣帶領至民主鞏固的階段，但在整個修憲過程中也促成了日後國民黨分化、整合上的困難；另外，李登輝在鞏固其領袖地位時不斷攏絡地方勢力與在野之力量，造成黑金政治更加嚴重、台獨運動興起；⁸⁸在經濟方面的改革上，金融過度的自由化，使得政治與經濟密切結合，企業會以自身利益為考量去影響政策制定過程，金權政治因而產生。總之，此時期的李登輝雖能因應國內外情勢而對政治經濟制度有所改革，但卻也產生了上述之不良影響。

第三節 陳水扁時期(2000-2008)

2000 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了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這也是

⁸⁷ 陳元保，1996，〈總統大選前後的金融政策〉，《經濟前瞻》，頁 54-61。

⁸⁸ 李本善，2000，〈台灣民主化後的政經改革-李登輝、陳水扁時期之探討〉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

長期由國民黨統治的台灣，首度的政黨輪替，邁向民主鞏固的時期。而在此時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南韓在遭受亞洲金融風暴之嚴重衝擊後的經濟表現卻可持續成長，相較之下台灣的經濟卻在政黨輪替與自由化之後持續的衰弱。⁸⁹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造成台灣經濟衰退的原因除了外在環境的因素，還有國內之政治因素，下面將以陳水扁執政時期所做之政治經濟改革分別論述。首先，在政治方面，以下分點加以說明：

壹、政治改革

在陳水扁執政當時最令人有所爭議的就是憲政體制的運作，陳水扁總統的兩任八年任期中，其間歷經兩次立法委員選舉，總統與立法院多數未曾一致過，閣揆人選實質決定權的問題也備受爭議，陳水扁始終是依己意任命閣揆。⁹⁰陳水扁所先後任命的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等六任閣揆，都不是基於立法院的多數意見所產生的人選，所組成的內閣也因此皆是少數政府，陳水扁便在此背景下開啟了八年的執政。

一、政策缺乏連貫性、有失誠信

陳水扁在 2000 年國民黨的分裂參選之下，只以相對多數但沒有獲得過半數的選票當選總統，因此喊出「全民政府」的口號，並任命國民黨的唐飛為行政院長，無非就是希望可以克服體制上的問題，但朝野相互缺乏信任的情形依然存在，實際上陳水扁不但沒有遵守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原則，還一手掌握了政治權力，在其任內的行政院長，八年期間有六任行政院長，都成為「短命內閣」，但除了行政院長之外，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等等也都更換

⁸⁹ 彭慧鸞編，2008，《番薯與泡菜：亞洲雙龍台韓經驗比較》。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頁 155。

⁹⁰ 蘇子喬，2010，〈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1991-2010)：歷史制度論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頁 147-223。

頻繁，導致政策實施缺乏延續性，政府空轉、沒有效能，⁹¹核四的停建不只違反了政策延續的合法性，也失去了在野黨的信任，導致朝野惡鬥的危機，並且陳水扁也積極的推動本土化與正名之政策，使得朝野關係更加惡化，而國內政治上的混亂當然也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影響著國家的競爭力。

二、兩岸關係停滯不前

陳水扁在 2000 年 5 月 20 日的就職演說中，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四不一沒有」的說法，指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用武，陳水扁保證在其任內就「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⁹²但在 2002 年陳水扁又提出「台海兩岸、一邊一國」的主張，是對「四不一沒有」的重大修正，引發中國的不信任。不料陳水扁又在 2006 年宣布廢除國統綱領；2007 年在出席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會議時，進一步宣稱「四要一沒有」即「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台灣要發展；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⁹³陳水扁對兩岸政策的前後不一，無一是將兩岸關係推到危險的邊緣。

三、外交關係邊緣化

陳水扁在上任前曾提出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的台灣國際新角色做出發，並以主權獨立為優先、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為共同核心的正常化外交關係，以及多元外交為全面參與國際社會的起點。但事實上陳水扁執政八年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不但沒有讓台灣站起來、走出去，反而只為追求一時的效果讓台灣地位更加

⁹¹ 陳國祥編，2008，《哭泣的台灣-看民進黨執政八年》。台北：INK，頁 53。

⁹² 陳水扁，2001，《世紀首航》。台北：圓神，頁 326。

⁹³ 同註 88，頁 88。

邊緣化。不只是兩岸關係惡化，2006年陳水扁提出的「廢統」之說，使得美國拒絕陳水扁過境紐約，2007年政府不顧美國反對，一味推動入聯公投，致使台美關係也跌到了谷底；⁹⁴並且在民進黨執政下，我國邦交國數字也從2000年的二十九個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二十三個，⁹⁵外交關係節節敗退。

此時的政治因素更是造成台灣參與區域制度被邊緣化的困境，台灣除了參與亞洲開發銀行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活動外，幾乎被排斥在東亞政經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之外，台灣無法參與東亞經濟的整合，再次的突顯出台灣當時在國際政治上被孤立的困境。⁹⁶

四、第七次修憲

2005年的第七次修憲主要重點為：立委席次減半由二二五席減為一一三席，立委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廢除國民大會，修憲案由公民取代國民大會行使複決權。雖然公民取得修憲案複決權，有助於落實國民主權，但門檻過高，修憲似乎難以實現。⁹⁷

從民國八十年代以來，中華民國經過七次修憲，然而修憲的結果似乎沒有解決台灣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的爭議，我國憲政制度設計的不夠健全，其中包含了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責，但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卻無須立法院之信任或同意，導致行政院長寧願執行總統意志，使得其對立法院負責之精神完全消失，並且總統與行政院長同時各有決策權，也導致政策反覆不定，喪失了政府的

⁹⁴ 同註90，頁70-71。

⁹⁵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mofa.gov.tw/>。

⁹⁶ 陳新之，2004，〈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7期，頁19-45。

⁹⁷ 楊日青，2006，〈憲政之困境與出路〉，《台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4期，頁106-108。

威信，⁹⁸而這些修憲的過程也使得台灣憲政運作更為混亂，陳水扁其不尊重憲法的精神，也導致在其執政期間，造成政黨間惡鬥，使台灣政局限於紛亂不安的狀態。

貳、經濟改革

而在經濟方面，台灣的經濟發展在陳水扁的執政期間有日漸下滑的趨勢，產業外移、外商不前來投資、企業倒閉造成失業率創下新高，中央政府的赤字與債務也節節上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之能力受到限制，⁹⁹由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金融機構也面臨了來自國外大型銀行的競爭壓力，政府為因應此國內、國外經濟金融環境的重大變遷，其改革方向如下：

一、核四案爭議不斷

首先，陳水扁 2000 年上任後，一方面邀請在野黨領袖入府協商國事；一方面卻已經決定停建核能第四座發電廠。核四停建不只是違反政策的延續性，也導致了倒閣與罷免陳水扁的憲政危機，事實上，核四的建或不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有很大的爭議，立法院在當時也一度通過廢止核四計畫案，但後來因為行政院認為停建核四窒礙難行，損失龐大，且為經濟發展所需，所以提出覆議，之後立法院在評估後，仍決定續建核四。¹⁰⁰陳水扁政府讓人引發爭議的關鍵在於其忽視了憲政的體制與憲法的規範，無法得到朝野間的共識，造成此後朝野間的對立，公共政策無法推動。

⁹⁸ 楊日青，2003，〈憲政運作之亂象及改進之道〉，《國家政策論壇》，冬季號，頁 1-12。

⁹⁹ 袁鶴齡編，2003，《全球化 VS 區域化：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台北：鼎茂圖書，頁 284。

¹⁰⁰ 同註 90，頁 54-55。

二、兩岸經貿問題

接著，在陳水扁政府許多具有爭議的經濟政策中，兩岸經貿政策的保守與限制可能是最嚴重的問題。2001年第一次經發會結束後，陳水扁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原則，但又在2005年的元旦文稿中宣布，兩岸經貿政策的原則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其主要限制包括：不准台灣的銀行在大陸設立分行，只能設辦事處、兩岸直航遲遲不能開放、對貿易商品方面，仍有許多種類是不準從大陸進口、對於開放大陸來台觀光政策，移植遲遲無法完全落實，¹⁰¹這些兩岸經貿的諸多限制，使得台灣企業界無法充分利用兩岸相互的利益來加強企業本身之實力，也使得台灣國家整體競爭力受到很大的傷害。

三、金融制度改革

在金融制度改革上，由於當時金融機構家數過多，且其個別市場佔有率偏低，整體經濟環境不佳、金融市場競爭加劇以及金融集團的興起，導致金融監理效能受到了挑戰，台灣的金融環境持續低迷。¹⁰²為此陳水扁政府將金融領域的改革作為其經濟改革的重點，透過改造基層金融制度，消除銀行呆帳，並提出「二五八改革方案」，即在二年內將金融機構呆帳比率降到5%以下，銀行資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而這就是所謂的一次金改；2004年10月，陳水扁又拋出第二次金融改革方案，要在2005年底實現公營金融機構的公股減半、2006年底實現金融控股公司減半、促成三家金融機構市場佔有率在10%以上、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到海外上市等四大目標。然而，要完成所謂的二次金改，是一

¹⁰¹ 同註90，頁125-126。

¹⁰² 姚文成，2009，〈二次金改金融監理制度-個案與檢討〉，《績效與策略研究》，第6卷，第2期，頁1-17。

個極為艱巨的任務，而且改革的時程、目標與做法等在當時也引起各界的質疑。而陳水扁最令各界所批評的也就是二次金改之政策，其重點在於改善金融機構體制並提升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但卻引發外界質疑涉及公股股權的管理，在合併的過程中導致財團趁虛而入，有將國家資產低價售出、圖利財團之疑，¹⁰³產生不當的政商關係。

在重要的金融監理制度上，為因應金融業務合併監理之趨勢，在 2004 年 7 月成立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但依然產生執行金融政策的主管機關事權不統一之情形，也就是金融監督權與金融政策權分別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財政部負責，造成事權混亂，¹⁰⁴使其無法發揮最大功用；再者，對於國際研究機構與外商較為關切的不良資產等，資訊揭露的體制沒有作太大的改變，¹⁰⁵金融改革的失敗也造成日後台灣經濟發展受阻，而此時期在政府一味的只實施自由化、民營化的政策之下，不只讓政府與財團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也使得政府主導之能力大幅下降，這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隱憂。

參、政府施政滿意度

最後，在陳水扁執政八年以來政府施政滿意度的部分，本文主要輔以國內三家主要媒體民調機構(聯合報、TVBS、遠見雜誌)，對陳水扁整體施政的調查結果加以說明，表 2-2 為 TVBS 所公布之陳水扁八年來施政滿意度趨勢表，表 2-3 則為 TVBS 民調中心

¹⁰³ 宋鎮照等著，2009，《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頁 236。

¹⁰⁴ 姚文成，2009，〈二次金改金融整併監理制度-個案與檢討〉，《績效與策略研究》，第 6 卷，第 2 期，頁 1-17。

¹⁰⁵ 郭秋榮，2002，〈主要國家金融監理制度變革及其對我國之啟示——兼論我國規劃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www.cepd.gov.tw/。

所公布之陳水扁執政八年以來各項施政排行榜。由表 2-2 可以看出陳水扁執政八年後，民意支持度大幅地下降由原本的 77% 下滑至 13%；而同時聯合報民調中心的資料也顯示陳水扁由上任時 76% 的滿意度在其卸任前下降至 16%。¹⁰⁶

遠見雜誌也在 2008 年 6 月也公佈了民眾對陳水扁以及民進黨執政團隊所做出的評價，結果顯示民眾對陳水扁及其所屬政黨之八年來施政滿意度均不及格，陳水扁總統 46.3 分，民進黨團對 47 分，都沒有達到 60 分的及格標準；¹⁰⁷ 而由表 2-3 則可看出民眾對陳水扁執政八年以來，只有交通建設這項是高於五成，甚至在其他項目上，不滿意程度皆高於滿意，而不滿意程度最高的項目即為經濟發展，台灣在陳水扁執政期間經濟發展明顯趨緩，由於經濟環境的整體欠佳，致使國人及外商的投資意願大幅下降，失業率上升、經濟成長率偏低，導致國際競爭力的下滑。

表 2-2：陳水扁執政八年施政滿意度趨勢表

事件	就職 滿月	八掌 溪事 件	核四 停建	睦誼 之旅	就職 兩周 年	連任 就職 前	連任 就職 周年	三合 一選 後	總統 論
時間	2000 6/19	2000 7/24	2000 10/27	2001 6/5	2002 5/13	2003 5/13	2005 5/17	2005 12/15	2006 2/7
滿意	77	53	37	39	51	43	33	10	15
不滿 意	8	29	49	43	38	42	51	73	67

(續)

¹⁰⁶ 聯合報系民調中心，2008，〈陳水扁施政滿意度〉，<http://mag.udn.com/mag/abian/storypage.jsp>。

¹⁰⁷ 遠見雜誌民調中心，2008，<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87316423171.pdf>。

連胡 會	興揚 之旅	執政 六年	施明 德倒 扁	出訪 帛琉	扁說 明機 要費	黨內 初選	執政 七年	宏誼 之旅	執政 八年
2006 4/18	2006 5/9	2006 5/17	2006 8/15	2006 9/16	2006 11/6	2007 3/28	2007 5/22	2007 8/29	2008 5/13
13	15	16	10	12	12	20	17	18	13
68	60	70	73	70	66	60	57	65	69

資料來源：TVBS 民調中心，2008，〈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滿意度調查〉，

<http://www.tvbs.com.tw/>。

表 2-3：陳水扁執政八年來各項施政滿意度排行

項目	滿意	不滿意
交通建設	59	30
環境保護	41	45
推行社會福利	40	48
族群融合	26	62
改善治安	24	66
穩定兩岸關係	21	64
改善金融政策	17	68
掃除黑金	17	73
司法公正	16	68
促進政府廉潔	14	76
促進經濟發展	13	80
拓展外交	12	75
教育改革	12	79

資料來源：TVBS 民調中心，2008，〈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滿意度調查〉，

<http://www.tvbs.com.tw/>。

第四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依照本文先前對國家競爭力之主要定義為政府必須能有效的去執行其策略，並在過程中具有主導的角色，以及國家領導人所實施之政策方向，也會對國家競爭力有所影響。李登輝執政時期所實施之政治改革方面，六次修憲雖然確實提升了政府的國家能力，也漸漸的將台灣帶領至民主鞏固的階段，但卻也造成日後憲政體制的問題；而其在經濟改革方面，雖然有達到產業升級、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等目標，但在實施自由化政策的過程中，政商關係日益密切，政府監督的體制卻沒有跟著一起提升，也導致日後黑金政治的出現，影響了政府決策的能力，政治與企業關係漸密，在加上當時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都會影響著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成果。

而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期間，在政治改革方面，由於執政黨屬於少數政府，加上政策方向一直無法得到朝野間的共識，公共政策推動不易；在經濟改革方面，陳水扁一味地自由化也使得政府主導地位大為降低，並且在重要的金融改革政策上，過程中也有圖利財團之疑，因而導致不當的政商關係產生，施政績效低落與政局的不穩定，都是台灣當時經濟衰退的因素，進而使得競爭力無法有效的提昇，這也顯示出台灣當時國際競爭力下降主因與政府施政不佳有關。

而關於此競爭力排名之討論將在第五章與目前最受到國際矚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與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的競爭力排名，並與本文的論述做進一步分析說明。

第三章 1988-2008 南韓的政經改革

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成立，李承晚當選首任總統，但其後因李承晚於1960年以不正當的手段競選第四任總統，引起學生革命而被迫下台。李承晚下台後，由民主黨的尹潽善執政掌權，南韓進入第二共和。民主黨執政後，政府毫無效率，社會秩序混亂，遂在1961年由朴正熙為首發動軍事革命，針對第二共和的弊端作全面性之檢討，¹⁰⁸之後便發展國營企業來促進經濟發展，政府以威權方法分配經濟資源，南韓的經濟也有所成長，直到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後，翌年光州事件掌握權之全斗煥發動政變，且由國民議會選舉為總統，邁入第五共和，此時期的南韓政治開始民主化，經濟也開始自由化，許多大企業也在次時期成功的發展，政府雖想改變此種企業獨佔經濟的態勢，但是為了避免南韓經濟衰退，以及防止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因此大企業持續的成長，¹⁰⁹到盧泰愚執政時期此種情況更加的嚴重，而南韓經濟能成功的發展則是因為政府與企業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從1960年代開始，南韓以農業為經濟發展主要動能，積極的與世界經濟接軌，並且與台灣、新加坡、香港並稱為「亞洲四小龍」，而後在1970-1990年代初期的南韓政府有鑑於發展工業的重要性，便積極的在原物料和生產技術的進口上，奠定了南韓今日經濟發展的基礎，¹¹⁰然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卻讓南韓的經濟遭受嚴重的打擊，暴露出南韓經濟體制的缺陷，但在2000年以後南韓的經濟復甦的速度與成功受到了全球的矚目，到了2004年南

¹⁰⁸ 林秋山，2009，《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台北：台灣商務，頁41。

¹⁰⁹ 蔡增家，2005，《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頁50。

¹¹⁰ 邱達生，2009，〈全球經濟危機與亞洲情勢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2卷，第6期，頁80-87。

韓的 GDP 甚至超過了一兆美元，成為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¹¹¹而南韓政府是如何的讓原本在金融風暴中混亂的南韓迅速的穩定下來，並有著耀眼的經濟成長，以下將從 1980 年代後期的總統盧泰愚的政經改革開始分析。

第一節 盧泰愚時期(1988-1993)

首先，我們將南韓的政黨變化過程做一個整理，由於南韓的政黨體系並不像台灣一樣有明顯且穩定的固定政黨，南韓的政治領袖透過不斷的合縱連橫，導致政黨不斷的重組，因此南韓政黨平均的壽命大約為三年，¹¹²所以在此本文先將從盧泰愚開始的歷任總統所屬政黨與其當時其他主要的政黨做一個整理，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南韓政治情勢變化的基礎，見表 3-1。

而盧泰愚政權可說是一個由威權到民主的過渡政權，雖然仍舊保持著不少軍人政治的色彩，並且在不到五分之二民意支持下當選，但終究是透過民主程序所選舉出來的總統，其合法性是無庸置疑的。盧泰愚也藉著 1988 年首爾奧運會的舉辦，大力推行「北方政策」，大大拓展了南韓的外交，¹¹³以下分別論述盧泰愚時期所實施之政治與經濟的改革。

¹¹¹ 同上註，頁 80-87。

¹¹² 同註 88，頁 46。

¹¹³ 董向榮，2009，《南韓創造奇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 34。

表 3-1：1988-2008 年韓國總統所屬政黨表

時間	總統	所屬政黨	其他主要政黨與其領導人
1988	盧泰愚	民主正義黨	平民黨(金大中) 統一民主黨(金泳三) 自民聯(金鍾泌)
1993	金泳三	新韓國黨	國民會議(金大中) 自民聯(金鍾泌) 民主黨(李基澤)
1998	金大中	新千年民主黨	大國家黨(李會昌) 自民聯(金鍾泌)
2003	盧武鉉	開放的我們黨	大國家黨(朴槿惠) 民主勞動黨(權永吉) 新千年民主黨(秋美愛) 自民聯(金鍾泌)
2008	李明博	大國家黨	統合民主黨(孫鶴圭) 親朴無黨聯盟(金武星) 親朴聯盟(徐清源、李揆澤) 自由先進黨(李會昌) 民主勞動黨(千永世) 創造韓國黨(文國現)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彭慧鸞編，2008，《番薯與泡菜：亞洲雙龍台韓經驗比較》。
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頁 47。

壹、政治改革

大致上，1980 年代的南韓在政治方面，由於受到全球民主化浪潮以及國內經濟成長，導致光州事件的發生，此事件也促成了南韓將總統改為由人民直選之方式產生等等政治方面的改革，而 1988 年上任的盧泰愚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以下說明。

一、民主化宣言

盧泰愚在他競選期間時便發表了民主化宣言，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修改憲法，在此次的總統大選前完成總統由人民直選之方式；第二，修改總統法，最大限度地進行自由公正的選舉；第三，赦免金大中並恢復其政治權力；第四，擴大和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第五，只要不妨害國家安全，一切言論自由；第六，實施地方自治；第七，展開健全政黨活動；第八，進行社會淨化，創造彼此信任的社會共同體。¹¹⁴在此之後便開始針對當時的憲法逐條的檢討修正，其重點在於：總統改為人民直接選舉，並縮短任期為五年；減少總統權限；恢復國會之國政監察權；建立一個自由的經濟體制。¹¹⁵這些民主化宣言也讓當時的盧泰愚能夠擊敗其他候選人，順利的透過民主程序當選總統。

二、成立保守聯盟

雖然盧泰愚是以人民直選之方式產生之總統，但是在他上台之後所進行的國會改選，在應選二九九個席次當中，盧泰愚所屬之執政黨只獲得一二五席，金大中的平和民主黨獲得七十席，金泳三的統一民主黨五十九席，金鍾泌的自民聯三十五席，¹¹⁶盧泰愚的民主正義黨在國會無法過半，成為弱勢政黨，這種朝小野大的型態也對之後政策的執行產生了影響。¹¹⁷

但由於南韓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五年且不得連任的情形下，再加上為了贏得 1992 年的總統大選，金泳三與金鍾泌便與盧泰愚共組政黨，將保守勢力結合，而這也促成了日後金泳三將成為執

¹¹⁴ 同上註，頁 32-33。

¹¹⁵ 林秋山，2009，《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台北：台灣商務，頁 32。

¹¹⁶ 同註 108，頁 64。

¹¹⁷ 同註 88，頁 46。

政黨競選下任總統的候選人。

三、中韓建交

盧泰愚在中韓建交的問題上表現的非常的積極，有著很大的貢獻，由於中國在 1950 年介入韓戰的因素，因此認為北韓與中國不論在安全與經濟上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韓的經濟破敗，每年都須依賴中國給予大量的經濟支柱，一直是中國很大的負擔，隨著南韓的經濟成長，中國與南韓的關係改善，終於在 1992 年雙方建交，南韓頓時也成為中國發展重要的夥伴，¹¹⁸而中韓建交也為盧泰愚的「北方政策」畫上了重要的一筆，並且在兩國建交後一個月，盧泰愚也應邀出席訪問中國。

貳、經濟改革

在經濟改革方面，盧泰愚上台時，南韓經濟呈現穩定的發展，並且在 1988 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南韓經濟開始高度成長；市場快速的自由化，南韓政府無法像以往干預市場，而此時的國際體系也對南韓國內經濟產生了影響，南韓政府為因應此潮流便開始進行經濟自由化之政策，其主要改革的方式如下：

一、自由化措施：排除政府干預

在自由化方面，盧泰愚首先對南韓的政府架構進行重建，以鬆綁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其次則是開放股票市場與發行公司債，使得大企業的資金來源不被限制在銀行體系，也可以包含證券市場與外國資本市場，¹¹⁹加上經濟規模的擴大及日益複雜，導致南韓政府對財閥的控制力逐漸減小，將經濟運作方式由以往的政府

¹¹⁸ 同註 88，頁 92。

¹¹⁹ 同註 108，頁 62。

導向轉為促進市場自由競爭，¹²⁰總之盧泰愚的自由化改革目標主要包括了在控制市場上政府採取寬鬆之方式，以及金融機構與產業結構之改革，並且增加在國際上的競爭力。¹²¹

二、國際化政策

在 1988 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將南韓的經濟發展順勢推向了國際，而國際體系對南韓的影響則是由於冷戰剛結束，美國基於安全與經濟上的考量，便開始要求東亞國家開放國內市場及金融自由化，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南韓政府便於 198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金融國際化與放寬對經濟的控制，¹²²使得大企業開始積極參與政治以擴大自身的政商關係，但是政府放寬了對經濟的控制，導致政府能力也逐漸下降，在制定政策時開始受到來自私人企業利益之影響。而這種情況隨著大型企業逐漸成為南韓經濟的主力後，南韓政府的能力與影響力越來越薄弱。

而以對外的投資而言，在 1990 年以前，是以北美最為重要；其次是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而在 1992 年之後，一方面因為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當時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指示，使得南韓對中國的投資大幅的增加。¹²³

在進入 1990 年代之後，自由化更加興盛，因此南韓更加速的推動經濟自由化，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加大企業的政經勢力，大企業也自此開始影響政治，使得政府的改革更加的困難；並且此

¹²⁰ 吳家興，2005，《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頁 100。

¹²¹ Robert Bedeski,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Reform and Reconstitution in the Sixth Republic under Roe Tae Woo, 1987-1992*, NY: Routledge, pp.80.

¹²² 同註 108，頁 63。

¹²³ 同註 88，頁 146。

時的南韓總統盧泰愚五年的任期也即將結束，也在 1990 年由盧泰愚領導的民主正義黨、金泳三領導的統一民主黨以及金鍾泌的自民聯，三黨所組合而成的民主自由黨也形成了保守聯盟，¹²⁴來對抗改革派金大中的民主黨，形成了南韓日後二金(金泳三、金大中)的執政時期，也象徵著南韓軍人統治政體的結束。

第二節 金泳三時期(1993-1998)

金泳三於 1993 年就任南韓第十四屆總統，也是南韓第一位由民主程序選出的文人總統，其在就任之後也提出了所謂「新韓國」的主張，在經濟方面採取了科技創新、市場自由、財閥重組以及自由化與私有化的政策，逐漸擺脫過去的保護政策。¹²⁵另一方面，保守派代表金泳三的當選也顯示南韓人民希望透過漸進式的改革來轉變舊有的政治經濟體制，然而就在他卸任前夕南韓遭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嚴重的影響，以下將分別論述金泳三時期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改革。

壹、政治改革

1993 年繼任的金泳三為順應國內外經濟環境，在政治方面，除了繼續推動民主政治，也將南韓從軍人威權轉向民主政體，在南韓民眾高度的期待下，金泳三也開始對南韓的政經體制進行改革，而金泳三政治改革的主要重點在於建立一個廉潔、有能力的政府，大量任命學有專精的學者擔任部會首長，並去除官員的貪污惡習，¹²⁶其方式如下：

¹²⁴ 同註 50，頁 81。

¹²⁵ 王振寰，2002，〈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7 期，頁 85-139。

¹²⁶ 同註 108，頁 92。

一、提出「新韓國論」

所謂的「新韓國論」即包含了適時性、小政府、使政府組織擁有更迅速的資訊，以及更高效率且透明的行政，並且同時強化政府部門間的行政協調與溝通能力，¹²⁷也就是金泳三希望能藉由任用大量專業的學者來擔任各部會首長，以便改革過去軍人威權體制長期統治下所遺留的弊端，提升南韓政治民主的品質，並同時改革南韓從前政商勾結的亂象，希望南韓經濟在決策方面能運作的更透明化，¹²⁸所以有了接下來的改革。

二、改善政治獻金問題

誠如上述金泳三所提出的「新韓國論」，在過去的軍人威權體制下，南韓的政治環境是由軍人、官僚與大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¹²⁹所以大企業就必須給軍人領導者龐大的政治獻金，以利其在威權體制下從事壟斷產業，而軍人階層使用這些政治獻金來買票、拉攏政治官員以穩固政權，但是此種情形在民主轉型之後日漸惡化，受到民主化的影響，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導致政治獻金需求日益增多，並且政治人物也會為了贏得選舉而配合企業部門的要求，¹³⁰因此造成了南韓在政治上貪污腐化的特性，所以金泳三上任後便嘗試去改變南韓的貪污體制。

首先，在去除貪污上，由於在過去的威權時期，國家的政府官員財產是不透明的，也因此經常會有收受賄賂的情形發生，所以金泳三在他就任時就將他的總財產公布，並且也促使南韓國會

¹²⁷ 張英，1995，〈金泳三總統的新韓國論簡析〉，《韓國學報》，第13期，頁146-154。

¹²⁸ 楊以彬，2006，〈南韓民主化過程之簡析-以Huntington民主化理論為分析觀點〉，《人文與社會》，第1卷，第9期，頁301-331。

¹²⁹ 同註88，頁97。

¹³⁰ 蘇希亞譯，康燦雄著，2004，《貪瀆者-韓國奇蹟與菲律賓經驗》。台北：早安財經文化，頁200。

通過「政治人物資產揭露法」，¹³¹表示以後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將在就職後定期的公布其財產，並且他也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以貪汙罪起訴，希望塑造政府清廉的形象，但是金泳三在此事件上卻受到來自其保守勢力的反對壓力，¹³²也讓南韓人民懷疑其動機。

其次，金泳三也在 1994 年促使國會通過「實名金融交易法」，也就是包括個人與企業在銀行、證券、期貨以及外匯交易都必須使用真名登記，以改過去南韓在金融市場中，普遍充斥著以假名或以人頭帳戶來進行交易，¹³³讓政治人物有收受不法政治獻金的管道，但在這中間也爆發了金泳三次子向大企業收取政治獻金的醜聞，並且在審判全斗煥與盧泰愚的過程中卻也讓金泳三捲入貪汙弊案當中，政治改革成效有限。

從金泳三上任之後的政治改革方向，可以看出金泳三是想積極改變過去官商勾結的政治風氣，但卻在審判全斗煥與盧泰愚的過程中，金泳三卻也涉入其中，這也讓金泳三清新的形象大大地受損，但真正讓南韓經濟衰退的則是金泳三所實施的經濟改革政策。

貳、經濟改革

首先金泳三就任後希望能夠對大企業的結構進行改革，以避免財閥左右南韓的經濟發展，改變過去政府對大企業的偏好，但之後卻在其一連串的自由化政策以及開放市場解除管制下，使得

¹³¹ 同註 108，頁 100。

¹³² 張剛嘉，2002，〈政治安定、經濟結構與民主鞏固：比較台灣與南韓〉，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

¹³³ 同註 108，頁 101。

大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而在金泳三執政時期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帶領韓國走向經濟改革之路，由政府扶植財團發展經濟，也產生了財團壟斷經濟的結果，導致 1997 年的亞洲經融風暴深深重創南韓。

一、「新經濟」：自由化政策

在經濟方面，為了要加入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則提出自由化與全球化之開放市場政策，並提出「新經濟」的概念，認為以往靠著政府的指令、管制發展的方式，在民主化與自由化之下以行不通，必須要有民間的參與，同時也要拓展國際市場，全力推動經濟國際化，¹³⁴以提升南韓經濟在國際上的地位，在自由化主要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在資本自由化上，金泳三提出全球化的主張，讓外國投資客可以自由投資南韓的股票市場，也允許國內企業投資國外的資本市場；第二是在銀行自由化方面，金泳三不只開放外資到國內經營證券業，同時也開放外國銀行到國內開設分行；第三，在外匯自由化方面，金泳三政府發表了「外匯自由化宣言」，讓國內外資金可以輕鬆的相互流動，而這些自由化的措施讓企業資金來源越來越多元化，¹³⁵導致南韓政府管制企業的能力以及整個金融市場體系都更為脆弱。

二、財閥體系

金泳三在他的就職政見當中提出了大財閥規模縮減的經濟目標，並極力的降低銀行體系對大企業提供資金，並且提高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補助，以縮減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規模，¹³⁶金泳三同時也對財閥的體制進行財務透明化政策，並且也希望能夠降

¹³⁴ 同註 50，頁 39。

¹³⁵ 同註 88，頁 166。

¹³⁶ 同註 108，頁 123。

低財閥在經濟產業中的比例，以避免財閥左右南韓的經濟發展，但是這些政策卻實施不久，加上南韓金融體制的脆弱，大企業也常利用政治獻金以促使政府讓金融機構優惠對大企業的貸款，¹³⁷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則在於金泳三的自由化政策，讓大企業獲得國外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金融管道，使得大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大財閥規模縮減計畫宣告失敗，因而也引發了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南韓財閥連鎖的財務危機。

三、經濟改革的失敗

由於金泳三在經濟的改革上認為政府干預企業越少越好，須解除在經濟方面的管制，才能使產業迅速發展，希望南韓經濟能夠真正的透明化。但靠著前任政府力量的結合才能順利當選的金泳三，也使得他的政策易遭受到舊有政權與其黨內強烈的反對，且過度的自由化也使得政府無法在危機發生之前提早處理，再加上大企業資金來源多元化而規模逐漸擴大以及在自由化措施下南韓官方介入銀行體系的比率逐漸降低，金泳三的自由化政策也未替銀行設置防護制度，導致銀行體系也不可避免的捲入金融危機中。¹³⁸

最後在金泳三即將卸任之前，南韓突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之侵襲，使得南韓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之協助，也使得金泳三的改革宣告徹底的失敗。而南韓之所以受到 1997 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主要因素除了東亞國家貨幣貶值、購買力大幅下降，外資極速撤離，¹³⁹還有南韓本身大企業所佔經濟體的比例過高，在遭受到經濟嚴重衰退、企業收入下降，導致企業倒閉數量大增，

¹³⁷ 李東華，1998，〈韓國大企業的危機及改革〉，《經濟前瞻》，第 60 期，頁 68-74。

¹³⁸ 同註 108，頁 124。

¹³⁹ 同註 50，頁 45。

而一旦企業倒閉，銀行也將出現高額的債務，使得南韓的經濟體系受創嚴重。¹⁴⁰與此同時，南韓也正面臨著政黨的輪替，而當時處於反對黨的金大中則在執政黨的分裂狀態之下順利的當選南韓第十五屆總統。

第三節 金大中時期(1998-2003)

在討論金大中改革的政策之前，本文先將南韓目前所實施之改革前後做一個比較，見表 3-2。

表 3-2：南韓政府主導與自由化時期政經體制比較

項目	政府主導時期(1970)	自由化時期(1990)
政府產業政策	重化工業政策	產業轉型 高科技與製造業為主
財閥資金來源	主要來自銀行體系	包括銀行體系、證券市場、 海外金融市場 屬於多元化管道
企業投資保障	由政府提供信用保證	改由企業自行負擔投資風險
政府監督功能	政府以銀行資金來控制 企業發展	企業資金來源多元化造成 政府控制失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蔡增家，2005，《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頁 126-127。

而由表 3-2 可以看出南韓在經過金泳三的自由化政策後，政經體制與過去政府主導時期已經是大不相同了；而接下來金大中的上台也代表著南韓政權和平的轉移，這雖然不能代表著穩定的政治民主，但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此時的南韓正面臨著戰後以

¹⁴⁰ 蔡增家，2008，〈政府主導與經濟發展：金大中時期南韓大企業改革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22 期，頁 1-32。

來最大的金融危機，必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五百七十億美元的援助，因此金大中於 1998 年繼任時，便保證會全力配合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條件，而政黨輪替後的金大中要如何著手進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使南韓平安的度過此次的金融危機。

壹、政治改革

當時的金大中不只要面對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同時還必須面對國內政治環境的挑戰，所以在政治方面，金大中面臨到的是本身是少數政府執政的困境，在國會裡面必定會受到在野黨的反對，造成許多政策法案無法順利的推行，於是金大中便與金鍾泌的自由民主合作，任命金鍾泌為總理，建立良好的關係，其在政治方面的重點有建立兩金政府與北韓的陽光政策。

金大中之上台之後，與金鍾泌的自由民主聯合，以共組政黨執政，但兩人的理念卻是大不相同，金大中之威權時其是反對運動的領袖，也一直是在反對軍人政府的立場，而金鍾泌則是在軍人政府時期擔任總理等要職，一度是朴正熙的左右手，¹⁴¹兩人的政治主張迥異，最後卻為了 1997 年的總統大選而結合，兩人合作的前提包含了要贏得選舉以及修改南韓的憲政體制，但是金大中之主政之後，卻以提振經濟做為藉口推託，並假藉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使得修憲改制終究並未實現，於是金鍾泌便在 2000 年宣布退出聯合政府，¹⁴²結束了兩金共治時期，另一方面自民聯也在當時的國會選舉中落敗，南韓政治依然呈現朝小野大的局面，金大中之改革也無法維持高度的順暢了。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時期執政黨與在野黨卻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這也是金大中之日後的改革依舊可以成功執行的原因。

¹⁴¹ 同註 88，頁 48。

¹⁴² 同註 108，頁 179。

在面對北韓的態度上，金大中一再表明與北韓願意修好的意願，而且也願意與金正日舉行高峰會談，對於南北韓的政策上，金大中則認為要以柔克剛，於是在2000年金大中則提出了「陽光政策」，其主要的重點為：第一，不會容忍北韓任何的武力挑釁；第二，南韓將不會以任何方式試圖合併北韓；第三，南韓會主動積極尋求北韓合作，¹⁴³也就是金大中認為南北韓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抗，短期內很難實現統一的目標，因此金大中政府認為當務之急即採取和平、和解與合作之方式處理南北韓之關係，透過更多頻繁的交流與合作，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¹⁴⁴但儘管如此，兩韓的官方都積極的進行接觸與對話，但卻由於雙方互信基礎薄弱，敵我意識根深蒂固，因此朝鮮半島的基本情勢仍然維持著緊張對峙的局面。但是金大中也因長期從事民主運動與對南北韓和解有卓越的貢獻，也讓其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之殊榮，但金大中卻於執政後期因家屬與親信相繼介入貪瀆案，使得新千年民主黨在2001年的國會補選中嘗到敗績，並亦於隔年退出該黨。

貳、經濟改革

在經濟方面，導致南韓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可分為兩點：第一，國際市場環境因素，與亞洲金融危機有關，1994年開始南韓就有因出口大幅增加而導致經常帳收支惡化的情形，而資本自由化措施，再加上南韓國內利率高，導致大舉向外國借貸，而後的兩年南韓就因為要償還短期債務而造成資金緊縮，外匯存底迅速下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南韓發生債務危機；第二，南韓內部性結構的因素，韓國企業從1980年代開始就有過

¹⁴³ 董向榮，2009，《南韓創造奇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35。

¹⁴⁴ 朱松柏，1999，〈南北韓新政府的統一政策及其進展〉，《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11期，頁19-29。

度依賴外資、信用擴張的情形，¹⁴⁵且金融機構被政治所利用，部分原因便是在於金泳三時期所實施的自由化政策，一味的開放國內市場與解除國內金融體制的管制，而未進行積極的管制政策，而在過去南韓銀行體系巨額的不良債卷以及官僚與財團、銀行之間的利益關係，使得南韓政府的監督一直存在著很大的問題，¹⁴⁶兩者相互影響下，南韓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金大中的改革也幾乎是依照國際貨幣基金所擬定的方向。以下先將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紓困的條件做整理，見表 3-3。

金大中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下宣布就職，因此遵循著國際貨幣基金的改革方案，對南韓的銀行體系、大企業結構與政商關係作全面性的改革，但是也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的救助，使得南韓經濟可說是由國際貨幣基金所主導，接受其經濟託管。¹⁴⁷同時，金大中為了表示其徹底改革大財閥的決心，便任命反財閥的學界人士為財經院長及金融監督委員會官員，並且金大中認為南韓經濟的衰退原因，是因為財閥結構過於集中以及金融體系缺乏效率，¹⁴⁸所以他便針對財團的結構進行調整，藉此改善過去由財團主導的經濟發展，並且進行金融重整，同時整頓不良債權過高的銀行以及銀行的合併，減少銀行數目，以消除過去累積的巨額不良債權，另外金大中也加速開放金融市場，以提升國際競爭力。¹⁴⁹

¹⁴⁵ 蘇顯揚，1999，〈金融風暴下的日本與韓國〉，《經濟前瞻》，第六十二期，頁 40-44。

¹⁴⁶ 蔡增家，〈管制、自由化與再管制：2000 年之後台灣與南韓政經轉型的比較〉，《中政會論文》，頁 1-23。

¹⁴⁷ 吳家興，2005，《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頁 186。

¹⁴⁸ 蔡增家，2005，《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頁 182。

¹⁴⁹ 同註 146，頁 1-32。

表 3-3：IMF 對南韓的紓困條件與內容

主要條件	內容
總體經濟指標	調整經濟成長率、控制消費者物價上漲率以及經常帳逆差。
貨幣及外匯政策	央行應緊縮貨幣供給、維持現行浮動匯率制度與公開外匯資料。
財政政策	緊縮財政政策、刪減預算支出、增稅。
貿易自由化	取消與貿易有關的補貼與進口限制。
勞工市場	促進勞工市場彈性化、實施失業救濟。
大企業管理	提高公司財務透明度、所減企業負債比率、改革大財團其下企業的相互借款保證制度、減少政府政策性貸款。
金融改革	通過金融改革法案、保障央行獨立、強化物價穩定、成立金融監督院、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合併南韓金融機構。
金融市場自由化	加速開放金融市場、放寬外資持股比例。

資料來源：吳家興，2005，《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頁 184-185。

所以，當時的南韓政府主要進行的是關於政府監督體系、大企業結構的改革以及金融機構的重整，由於企業與銀行的倒閉造成大量的失業人口，必須改造南韓國內的經濟體制，如政經資源被少數財閥所掌控、中小企業難以生存等等問題。¹⁵⁰總之金大中時期的經濟改革主要包括金融改革、企業重整、勞動部門結構重整及公共部門改革等。¹⁵¹

因此，首先在政府監督體系上，金大中為解決此問題先後成立了金融監督委員會與計畫預算局，以統合國家整體預算與經濟發展政策，另外金大中也成立了政府政策協調辦公室，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策溝通，之後也強化了公正貿易委員會，鼓勵中小

¹⁵⁰ 楊鈺池，1998，〈韓國金融危機的啟示〉，《經濟前瞻》，頁 84-88。

¹⁵¹ 吳家興，2000，〈南韓經濟改革及其成效之研析〉，<http://www.cepd.gov.tw/dn.aspx?uid=1204>。

企業創業，以減少財團占據產業的比例。¹⁵²

其次，金大中在企業結構改革方面，他將大企業的核心事業做了清楚的分別，以避免企業之間重複投資與產業過剩的情況，另外南韓政府也規定大企業必須將非重點營利之部門機以裁撤，¹⁵³同時也宣布允許外國惡意併購國內企業以及准許大企業進行大規模裁員，另外也公布所有有問題的企業名單，希望透過政府當局來加以整頓。¹⁵⁴1998年，南韓政府與五大企業(包含現代、三星、大宇、LG、SK)簽署重組協議，要求南韓五大企業清理債務，裁撤了近半數的事業單位和進行業務交換，¹⁵⁵以及在金融機構與大企業之間的借貸與出資必須要界定清楚，以避免利益輸送關係。

再者，在進行大規模的金融重整方面，首先下令不良債權過高的銀行立即停止營業，並設立專門的金融監理委員會，之後在將南韓最大銀行朝興銀行進行國有化，金大中政府也為了要緩和銀行倒閉帶給國內經濟的衝擊，採取了積極合併經營狀況良好的銀行，並接管經營不佳的銀行，以減少銀行數目，強化國際競爭力。¹⁵⁶大體而言，南韓金融機構的重整，目標在於整頓問題金融機構，藉由金融機構的合併、重整，改善金融機構過多的現象，以提升經營效率，南韓金融機構經由關閉與合併，從1997年的2,102家縮減至1999年的1,755家，其中銀行也由原來的33家減為23家。¹⁵⁷

¹⁵² 同註 146，頁 1-23。

¹⁵³ 蔡增家，2008，〈政府主導與經濟發展：金大中時期南韓大企業改革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22 期，頁 1-32。

¹⁵⁴ 同註 88，頁 174。

¹⁵⁵ 蘇顯揚，1999，〈金融風暴下的日本與韓國〉，《經濟前瞻》，第六十二期，頁 40-44。

¹⁵⁶ 同註 88，頁 176。

¹⁵⁷ 吳家興，2001，〈南韓經濟改革及其成效之研析〉，《經濟研究》，第 1 期，頁 229-250。

總之，金大中在經濟方面改革的項目主要包括了銀行體系、政商關係的改革以及縮減了大企業的規模，同時對企業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同時南韓政府也嚴格的管制政府與企業之間不當政商關係下的利益往來，在歷經此改革之後，不只是南韓政府與大企業間的政商關係有所轉變，也增強了政府對大企業的監督能力，間接的讓南韓的經濟創下新的高峰，¹⁵⁸而在金大中積極的改革之下，南韓很快就脫離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並且經濟在日後也穩定的發展。

金大中的執政前期對南韓國內經濟的改革，讓南韓成功的從亞洲金融風暴中走出，而金大中能在他執政前期順利的推動改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善於利用國際壓力，讓國會通過他所提出的法案，並且南韓政府也在 2000 年宣布還清之前向國際貨幣基金借貸的五百七十億美元，金大中的政治聲望達到了高峰，但不料接下來在 2001 年南韓的經濟成長突然停滯，而且金大中也同時面臨到來自美國與北韓方面的壓力，不但陽光政策停擺，也爆發金大中被捲入政治獻金的弊案當中，家族成員與親信官員紛紛傳出貪汙弊案，這對金大中個人的政治聲望產生了相當大的打擊。2002 年之後，南韓各黨也開始積極進行下屆總統候選人的角逐，而盧武鉉則代表當時的執政黨新千年民主黨，並且順利的擊敗代表保守勢力的大國家黨的李會昌，當選了南韓第十六屆總統。

第四節 盧武鉉時期(2003-2008)

2002 年 7 月，盧武鉉被推舉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同年 12 月，他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成為總統。2003 年 2 月 25 日，盧武鉉宣誓就任總統。盧武鉉的當選也代表著金大中、金泳三、

¹⁵⁸ 同註 152，頁 1-32。

金鍾泌「三金政治時代」的結束，南韓進行了世代交替，而盧武鉉上台之後在沒有競選連任得約束下，也對南韓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做了轉變。

壹、政治改革

盧武鉉在其上台之後的就職演說中提出「讓南韓走向和平、繁榮與飛躍」，並宣布退出新千年民主黨，另與其追隨者組成「開放我們的黨」，¹⁵⁹提出了許多的改革政策，並在南北韓政策上表示會以更自主的態度來繼續金大中的陽光政策，而在對美政策上，曾經高舉反美大旗的盧武鉉最終也投向美國的懷抱，2007年與美國簽屬自由貿易協定，使南韓與美國有了更緊密的結合，¹⁶⁰以下分別說明。

一、南北韓政策

盧武鉉繼承了金大中所推行的陽光政策，對北韓採取包容的態度，但由於先前2002年北韓發生了核武危機，也致使南北韓經濟合作交流停擺，為此盧武鉉提出和平繁榮政策，一方面透過國際合作，以和平方式處理北韓核武問題，另一方面則擴大南北韓的經濟交流，以追求南北韓關係的發展。¹⁶¹

盧武鉉政府在在面對北韓的核武問題上，提出了以下三點原則：第一，不允許北韓開發核子武器；第二，透過對話和平解決核武問題，反對訴諸武力相威脅，不允許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第三，發揮韓國在解決核危機中積極主導的作用，¹⁶²盧武鉉在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後，也全面展開對北韓的經濟支援與合作，以

¹⁵⁹ 蔡增家，2005，《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頁264。

¹⁶⁰ 董向榮，2009，《南韓創造奇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36。

¹⁶¹ 河凡植，2008，〈和平繁榮政策與中韓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1期，頁127-149。

¹⁶² 唐世平編，2005，《冷戰後近鄰國家對華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56。

達成雙方相互信任之基礎，以確保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

二、對美政策

在盧武鉉上台前，由於發生了美軍碾死兩名南韓少女的事件，而美軍事法庭竟判決其無罪，此舉引發了南韓民眾反美的情緒高漲，而這也使得反美態度強硬的盧武鉉順利得到民意的支持當選總統，但是無論盧武鉉對美態度如何強硬，還是要面對美軍是維持南北韓穩定最有力的保障，以致於盧武鉉對美政策沒有太大的改變，反而在 2005 年南韓與美國首度在首爾展開有關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協商，並且在之後 2007 年經過雙方諮商與談判後，達成協議正式簽署 FTA，在韓美簽署 FTA 後，也將為南韓整體經濟賦予新的成長動力。¹⁶³

三、國會彈劾

盧武鉉在 2004 年 3 月以總統的身份公開呼籲南韓選民在四月的國會改選中，投票給其所屬政黨，此舉便引發南韓選舉委員會認為違反公務人員不得為政黨競選的規定，於是南韓國會於 2004 年 3 月 12 日在全部二七一個席次中，以一九三票贊成，二票反對，四十七票杯葛的情形下通過對總統盧武鉉的彈劾案，而盧武鉉也是南韓史上第一位被國會提起彈劾動議的總統，其理由是違反選舉法之行政中立原則，總統親信收取政治資金和總統應該對經濟不振承擔責任等等，並即停止總統職權，由國務總理高健代行其職務，¹⁶⁴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而南韓的國會改選也在此動盪下舉行，選舉的結過是盧武鉉所屬「開放我們的黨」在國會中會得過半之席次，而之後南韓憲法法院也對盧武鉉總統彈劾案做出判決，宣布駁回國會提出的總統彈劾案，盧武鉉總統將立即恢復行

¹⁶³ 李在方，2008，《韓國崛起》。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頁 148。

¹⁶⁴ 林秋山，2009，《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台北：台灣商務，頁 104。

使總統權力，這也表示著盧武鉉往後更能依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改革，¹⁶⁵而此彈劾案也已對南韓的政治與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

二、經濟改革

盧武鉉上台時，南韓的經濟由原本的高度成長開始進入了停滯狀態，所以盧武鉉便提出對財閥結構進行改革，以及強調會擴大經濟參與的對外政策，並且在與中國之間的交易規模也有擴大的趨勢。

一、韓中經濟合作計畫

盧武鉉 2003 年 7 月訪問中國時，便與胡景濤共同協議，兩國關係從「全面性合作關係」擴大發展為「全面性合作夥伴關係」，同時達成共組「研究兩國間經濟及貿易合作方向小組」的共識；¹⁶⁶進而於 2004 年在寮國舉行的東盟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時，盧武鉉與溫家寶進行會見，為達到更深的韓中關係，中國提出了四項建議：第一，保持高層交往；第二，進一步擴大經貿合作；第三，推展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第四，加強溝通，妥善解決雙方所關切問題，兩國將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以及東北亞安全的機制中進行合作，¹⁶⁷未來兩國在區域化及國際間的合作，都會較過去更為密切。

二、對財閥改革之決心

在經濟議題方面，盧武鉉在其競選政見當中支持對財閥結構進行改革，南韓在八〇年代的經濟能夠快速成長主要是仰賴政府扶植大財閥所推展出的重化工業，而過去南韓政府所進行的大企

¹⁶⁵ 同註 108，頁 269。

¹⁶⁶ 同註 163，頁 148。

¹⁶⁷ 同註 161，頁 127-149。

業結構改革只是將所有大財閥共享的資源轉變成「三星」一家所獨享，南韓政府與大企業間依然是存在著複雜的關係，而盧武鉉上台後便進一步對大財閥進行規模縮減，並提振中小企業，決心改革政府與財閥之間利益輸送的關係，而這自然也會引起國會的反彈，導致盧武鉉經濟政策效果不彰。¹⁶⁸

第五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南韓從盧泰愚上台便開始了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政經改革，當時的南韓的經濟也在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開始發展迅速，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南韓政府並無法像從前一樣控制、干預市場，因此盧泰愚也鬆綁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使得許多大企業也開始積極的參與政治決策過程，而這個情形在進入 1990 年代金泳三執政時期之後，自由化更加興盛，政府改革的能力更為困難。

金泳三過度自由化的政策也導致政府無法在危機發生前做好因應措施，並在其卸任之前南韓受到亞洲金融風暴之嚴重的衝擊，經濟迅速衰退，而這也必然對南韓的競爭力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繼任的金大中政府便對南韓的金融、政商關係進行改革，並順勢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嚴格管制政府與企業之間不當的利益往來，加強政府主導的角色，也讓南韓的經濟有了明顯且穩定的成長，強化了南韓日後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以上為 1980 年代後期到 2008 年之間，台灣與南韓歷任總統所做的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改革，為了因應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壓力，台灣與南韓也都紛紛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其中在面對金融

¹⁶⁸ 同註 108，頁 265。

風暴的危機時，南韓政府順勢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控制了國內的經濟，並對財閥政商關係進行改革，調整大企業結構；而台灣則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政府只是堅持自由化之政策，積極的推行民營化，過度自由化的金融政策，導致官商勾結更加嚴重，也就是說，即使是在一個完善的制度環境下依然會存在著上層的腐敗者，當環境腐化時，在裡面生活和工作的政府官僚也必然會腐化，¹⁶⁹在加上當時執政者以政治意識形態治國，形成政治紛亂、經濟衰退的局面，間接影響了台灣整體的競爭力，也讓南韓有超越台灣的機會。接下來台灣與南韓在 2008 年政黨輪替後，所要面臨的是來自全球的金融危機，而兩國領導人要如何帶領國家度過危機？以下論述之。

¹⁶⁹ 王逸舟譯，米爾斯著，《權力菁英》。台北：桂冠，頁 433。

第四章 2008 年後台韓政經改革與比較

在這一部分將接續前面之討論，並且會在最後做一個台灣與南韓政經改革整體的比較。延續美國次級房貸的問題，2008 年美國券商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後，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衝擊著全球，不只讓歐美國家措手不及，也進一步加速全球金融市場與經濟的衰退。而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曾一度讓東亞各國的經濟陷入危機，在經過東亞各國政府出手捍衛，才使得經濟日漸成長，在危機中重建金融秩序，而走過東亞金融風暴後的亞洲國家，在 2008 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下，經濟也將無可避免的再次受到波及，而世界各國也都積極的應對此次的金融海嘯，此時國家機關的角色也就越顯重要，即時面對相同之全球金融危機，但各國所受之影響與面對之方式必然有所不同，政府要如何避免金融海嘯重創經濟，適當的實施政策因應，以擺脫經濟衰弱，並在金融海嘯後持續的維持其經濟成長，2008 年台灣與南韓都各自發生了政黨輪替，並且上任之執政者所實施之政策，都與其前任政府有著很大的差異，以下分別就台灣與南韓當時執政者所採取之方法加以說明。

第一節 台灣：馬英九時期(2008-迄今)

馬英九在 2008 年 3 月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國民黨在歷經八年後重新取得政權，並且國民黨也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掌握國會過半之優勢，一改過去八年朝小野大，政治不穩定之情勢，國民黨取得完全執政，而馬英九總統的政策方向也大多異於前總統陳水扁，其中兩岸關係也有了大幅改善，政府本應有更多的心

力去改革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議題，但與此同時卻發生全球金融海嘯，對台灣的經濟產有著巨大的打擊，¹⁷⁰無疑是當前執政者的重大挑戰。

壹、政治改革

2008年馬英九的上台為我國第二次的黨輪替，馬英九也在競選期間提出了民主再造工程，開始台灣民主第二階段的改革，包括了確立憲政主義的基本精神、實現權責相符的中央政府體制、落實司法獨立及行政中立、推動政黨良性競爭以及強化整治貪污的機制等等。¹⁷¹在行政與立法的互動上也有了改變，2008年1月首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得了七成以上的席次，成為國會最大黨，行政與立法多數由同一政黨掌握，使得我國憲政運作回到多數政府，也結束了陳水扁時期少數政府的政治責任不明、政府施政空轉的局面，但雖然憲政運作回到了多數政府，但實際上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互動與分工，依然充滿著爭議。

一、兩岸政策的轉變

在兩岸外交休兵及展開經貿會談後，台海已從「國際衝突引爆點」，轉變為「東亞經貿契機發展區」，讓台灣從「麻煩製造者」，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與「和平追求者」，¹⁷²並且馬英九也將兩岸關係作為主要的施政方向之一，上任後推動了一連串的政策改革，致力於雙邊關係的改善，基本上馬政府對大陸的政治立場，秉持著「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維護並鞏固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2008年6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的江陳會，提供了兩

¹⁷⁰ 蔡政文編，2009，《2009 台灣展望》。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頁 6。

¹⁷¹ 同上註，頁 57。

¹⁷² 宋鎮照，2009，〈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思維與新策略：從經貿整合到政治趨和〉，《全球政治評論》，第 28 期，頁 63-93。

岸官方交流的平台，並在此次會議中達成了包機和大陸人士入台觀光兩項議題；2008年11月4日，兩岸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官方管道，在台北舉行了第二次的江陳會，並在會中簽署了兩岸直航、郵政合作與食品安全等協議，2009年4月第三次的江陳會則在南京舉辦，以前兩次會議為基礎，針對定期航班、兩岸金融合作、共同打擊犯罪簽署三項協議，並對陸資來台發表共同聲明。江陳會談促進了兩岸的交流，使兩岸關係日漸回溫，積極開展兩岸經貿正常化，深化交流與合作，建立互信機制。¹⁷³總之，馬英九政府的主要政策目的在於以經濟發展兩岸關係，也希望藉此對抗全球金融海嘯。

二、活路外交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在外交政策上，相對於陳水扁政府時期「烽火外交」的政策，不只使兩岸關係陷入低迷，台灣邦交國的數字更是一路下滑；馬英九政府則提出了「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的理念，希望台灣能夠走出外交困境，¹⁷⁴並免台灣外交邊緣化，主張改善兩岸關係、擴展與邦交國關係、恢復與無邦交國之間的互信，並且在2008年11月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過去我方政府的高層官員都一直未能如願出席，而在新政府提出外交休兵後，最終由連戰出席，這也是過去台灣特使人選中曾擔任政府的最高層級的職位，¹⁷⁵另外，外交部也改變了加入聯合國之策略，改以敏感度較低的聯合國專門機構參與案，而不再直接訴求進入聯合國，過程中雖仍遭北京反對，但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卻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專門組織，最後台灣終於在2009年5月順利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¹⁷³ 同上註，頁 63-93。

¹⁷⁴ 陳國祥編，2008，《哭泣的台灣-看民進黨執政八年》。台北：INK，頁 87。

¹⁷⁵ 陳牧民，2010，〈主權理論與當前台灣外交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05-124。

(WHA)觀察員，開啟了加入國際組織的新指標。¹⁷⁶

貳、經濟改革

2008年由於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使得世界各國經濟都面臨很大的挑戰，而台灣各產業部門也陷入困境，馬英九政府也為了阻止當時經濟衰竭持續的深化，除了削減綜合所得稅、遺產稅之外，並透過「愛台十二項建設」增加基礎建設，擴大內需，吸引國內外廠商做更多的投資，以活絡經濟，其主要方式如下：

一、振興經濟方案

在經濟改革上，政府為了因應金融海嘯，當時行政院就通過了「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其主要的政策目標為「刺激消費」、「振興投資、加強建設」以及「穩定金融、促進出口」三個方面，包含照顧弱勢、鼓勵消費、促進就業、優惠房貸、加強公共建設、促進民間投資、穩定金融及股市、加強中小企業融資、拓展出口以及推動租稅改革等十項具體措施。¹⁷⁷而在穩定股票市場政策上，行政院將股市跌幅縮減至3.5%、實施國安基金護盤、全面禁止放空期間；並且宣布對所有金融機構存款採取全額保障措施；¹⁷⁸隨後行政院又再提出一波「振興經濟新方案」也首度提出《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經立法院通過，每人發放三千六百元消費券、擴大公共建設、推動都市更新、鼓勵民間投資，以及產業再造等，希望刺激消費市場，振興國內經濟。

¹⁷⁶ 同上註，頁105-124。

¹⁷⁷ 宋鎮照等著，2009，《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頁250。

¹⁷⁸ 同註170，頁377。

二、愛台十二項建設

馬英九政府所提出的「愛台十二項建設」主要包括了：全島便捷交通網、高雄自由貿易及生態港、台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桃園國際航空城、智慧台灣、產業創新走廊、都市及工業區更新、農村再生、海岸新生、綠色造林、防洪治水及下水道建設等。¹⁷⁹而政府推動這項計畫的基礎建設，不但每年會帶來十二萬人的就業機會，還因此有可能帶動國內許多產業的龐大需求，對提升民眾生計有明顯的幫助，但在推行的過程中仍有許多行政程序、政府法規以及物價變動等等問題，都須政府出面解決。

三、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在重要的兩岸政策上，馬英九則主張先經濟後政治，降低政治議題的干擾，以建立兩岸的互信基礎，並提出了兩岸在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策略，即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將協議雙方未來推動的經濟合作事項列出一個明確的範圍，並考量雙方的經濟條件，逐步減少或消除彼此間的貿易和投資障礙，以創造公平的貿易與投資環境，其項目涵蓋了服務貿易、避免雙重課稅、投資保障、貿易投資便捷化等等，促進台灣生存發展及雙方協商的機制，強化雙邊實質的經貿關係。

馬英九政府簽訂 ECFA 的主要目標有四個：第一，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第二，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如果台灣無法參與世界的自由貿易協定，那麼將面對被邊緣化的威脅，失去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三，促進台灣經貿投資國際化，

¹⁷⁹ 黃豐鑑，2009，〈2009年應全力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之交通建設以振興經濟〉，《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http://www.npf.org.tw/post/3/5252>。

ECFA 的簽訂也會使外商來台投資的更放心，也有利台商在全球的發展；第四，以 ECFA 來開啟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 的希望。¹⁸⁰而其中也有我們所不能忽略的問題，如台灣主權、台灣內部失業人口增加、農業難以生存以及早收清單項目對於台灣傳統產業的衝擊等，但整體而言 ECFA 的簽訂對台灣而言仍是利大於弊。

第二節 南韓：李明博時期(2008-迄今)

南韓受到 2007-2008 年國際原物料與能源價格的劇烈波動，以及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又由於美國是南韓第二大貿易夥伴，使得美國的經濟衰弱會對南韓產生很大的影響，如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南韓在遭遇金融風暴時，最害怕的就是外資大幅的撤離，衝擊股市與匯率；¹⁸¹而與此同時，2008 年南韓也出現了政黨輪替，李明博政府上台，而這也是大國家黨歷經十年在野之後，重新取得執政，實際上，南韓在前任政府盧武鉉的統治之下，出現了經濟不振、國民所得兩極化、社會分裂等等問題，也因此被外界認為是一個一意孤行的領導人，¹⁸²所以李明博上任後大幅地修改了前任政府之國內外政策，但卻也必須面臨著大環境種種不利的因素，以下是李明博當選後所實施之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改革。

壹、政治改革

在國內政治上，由於李明博政府是保守派的代表，但在 2009

¹⁸⁰ 劉性仁，2010，〈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台灣發展之效益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7 期，頁 90-107。

¹⁸¹ 邱達生，2009，〈全球經濟危機與亞洲情勢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2 卷，第 6 期，頁 80-87。

¹⁸² 林秋山，2008，〈南韓新政府對外政策之走向及背景〉，《展望與探索》，頁 105-109。

年受到代表著進步力量盧武鉉自殺的影響，造成南韓的政治更加的分裂與對立，李明博政府面臨著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南韓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創，以及本身國內政治的分立問題，對執政者而言是一個相當嚴厲的考驗。

一、北韓政策

在南北韓的關係上，李明博政府提出「無核、開放、3000」的計畫，即以平壤是否全面放棄核子計畫，作為兩韓合作與和解的前提，如果北韓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南韓將協助北韓在十年內實現平均國民收入達到三千美元，但卻引起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的強烈反彈，對李明博政府採取了對抗的態勢，¹⁸³將其解讀為首爾對平壤採取敵對政策的開端，因此兩韓不僅中止官方對話，經濟合作範圍亦持續縮小，北韓政府認為李明博自 2008 年上台以來，一改過去金大中與盧武鉉時期的陽光政策和和解路線，轉而採取強硬姿態¹⁸⁴，認為其打破了政策的連續性，並將北韓政策交由美國主導，放棄了南韓應有的獨立性，有「親美」的姿態。

二、修復韓美關係

李明博政府強調韓美同盟是保障韓國安全中的關鍵，2008年4月17日，韓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達成了關於韓國再次開始進口美國牛肉的條件和程式的協定。由於李明博為了獲得韓美FTA的批准進行了積極的努力，因此，下定決心接受美國議會要求，解除對美國牛肉進口的限制。但是李明博政府卻沒有確保起碼的安全措施，於是南韓民眾開始發起遊行而之後也演變成了持續長達四個月的蠟燭抗爭，¹⁸⁵這也是李明博上任不久後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¹⁸³ 同註 143，頁 41。

¹⁸⁴ 李大中，2010，〈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9-26。

¹⁸⁵ 李南周，2009，〈對韓國蠟燭運動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4 期，頁 445-456。

貳、經濟改革

在經濟上，李明博可說是南韓首位的經濟大統領，¹⁸⁶南韓民眾也寄予其厚望，希望他可帶領南韓經濟再次起飛，並實現「747計畫」：南韓經濟以每年7%的速度成長，10年左右每人均收入達到4萬美元，在世界經濟體的排名上升至第7位。但此時卻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創，南韓匯率大幅地波動，經濟呈現零成長，¹⁸⁷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南韓便面臨了嚴重的外債問題，在加上此時全球信貸市場緊縮的情形下，南韓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因此李明博政府上任的當務之急，就是必須以經濟、國民生活品質為第一優先，並且成立「國家競爭力提升委員會」，目的是縮小政府機關、增加效率，以節省經費、活化投資，恢復經濟發展，¹⁸⁸於是南韓政府相繼推出了兩次的經濟振興方案，其計畫如下：

一、經濟振興方案

南韓政府推出規模超過一千三百億美元的經濟振興計畫，以舒緩銀行面臨經濟不振，迫使企業貸款違約率上升的問題；其中的七十二億美元用以減稅與鬆綁建築法規，以及減輕中小企業與家庭利息負擔。並且南韓政府也將公共建設計畫提早，藉由提高政府預算支出計畫，以大幅增加社會基礎建設。¹⁸⁹

而第二次的振興經濟方案其規模約一百一十億美元，進一步於2009年斥資十一兆韓元刺激景氣，藉擴大公共支出、創造就業

¹⁸⁶ 同註163，頁220。

¹⁸⁷ 同註143，頁40。

¹⁸⁸ 林秋山，2008，〈南韓新政府對外政策之走向及背景〉，《展望與探索》，頁105-109。

¹⁸⁹ 余慕薌，2008，〈日韓政府祭出經濟振興方案期待新年新氣象〉，《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1卷，第12期，頁76-81。

機會及延長企業賦稅優惠等措施，並且以三兆韓元的減稅方案，期望拯救南韓陷入危機的經濟。¹⁹⁰另外韓國央行也宣布將銀行基準利率向下調降，以穩定金融市場，防止經濟嚴重萎縮，以及提供足夠的流動性資金以避免企業倒閉；¹⁹¹南韓政府也分別與中國與日本取得雙邊同意，分別成立換匯機制，以減輕金融危機對匯率的衝擊。¹⁹²

二、綠色新政

經濟危機的發生，使得南韓在貨幣政策上採取極度寬鬆的模式，將基本利率調降至歷史低點，南韓政府也在 2009 年年初宣布將執行大約五十兆韓元的「綠色新政」，預計在 2013 年完成，除了因應環境汙染與氣候變遷，也可望提供一百萬個就業機會。¹⁹³

第三節 小結：國家競爭力之評估

2008 年台灣與南韓都受到了世界金融海嘯的影響，在國內也都各自發生了政黨輪替，而兩國前任政府(陳水扁與盧武鉉)的下台可說都是因為在經濟政策方面無法有效的改善，而使得兩國的保守政黨重新取得執政權，並且台灣的馬英九與南韓的李明博都是以重視經濟繁榮為核心的政策。

馬英九方面主要是透過與中國簽訂 ECFA 以經濟發展改善兩岸關係，再加上振興經濟之計畫，擴大內需以促進經濟發展，而

¹⁹⁰ 劉靜容，2009，〈金融海嘯席捲後，亞洲各國如何力挽狂瀾？〉，《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2 卷，第 3 期，頁 97-104。

¹⁹¹ 同註 189，頁 76-81。

¹⁹² 同註 181，頁 80-87。

¹⁹³ 同註 181，頁 80-87。

在這過程中都須要政府有效的執行，提高政府效能，也對台灣在提昇國家競爭力上面有正面的作用。

南韓在經歷過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後，可以發現當年改革的成果也在此次危機中經得起考驗，外國投資者依舊對南韓保持著信心，市場恐慌也明顯的趨緩，¹⁹⁴這也可以看出南韓政府在李明博帶領下受到了肯定；但是，李明博本身的商界背景與企業間的利益關係，卻也是他政治上的一大阻礙，由於李明博視財閥為振興經濟的重要夥伴，然而南韓的財閥體系即是造成近年來南韓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沒有起色的原因，而這也是影響著南韓國家競爭力的因素。在下一節本文則會從上述 1988 年到 2008 年之間台灣與南韓在歷經關鍵時刻前後的執政者所實施之政經改革做一個比較分析。

第四節 關鍵時刻：比較台韓之政經改革

台灣與南韓在二十世紀末同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典範，並且也都有著「亞洲四小龍」的美譽，然而在經過民主化、自由化以及兩次的金融海嘯衝擊後，台灣與南韓兩國的經濟發展，卻呈現了大幅的差異，而根據前面的討論，可以將幾個關鍵時刻的執政者所實施的改革作比較，並在此分為下列幾點：

壹、台灣金融風暴、政黨輪替：比較李登輝與陳水扁

在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政治改革上，主要是透過六次修憲以改變台灣原有的憲政體制，也藉此以達到其鞏固自身政權的目的；而陳水扁執政時期也是藉由修憲的過程以加深國內政治上的對

¹⁹⁴ 同註 143，頁 92。

立，以穩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至於在經濟改革方面，李登輝雖然有達到產業升級、穩定台灣經濟發展，但在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過程中政治與企業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導致後來有黑金政治的產生；而陳水扁金融改革的過程中，涉及了公股股權管理的問題，有圖利財團之疑，同樣使得政府與財團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以擴大自己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見表 4-1。

表 4-1：李登輝與陳水扁政經改革之異同

	金融風暴前(李登輝)	金融風暴後(陳水扁) 政黨輪替
政治改革	同：都是透過修憲達成其政治目的	
	異：當時在野黨成為推動民主化政策的動力	異：少數政府在野黨反對勢力強大
經濟改革	同：自由化結果導致政商利益掛勾、黑金	
	異：促進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級，經濟穩定發展	異：金融風暴過後，經濟環境極不穩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南韓金融風暴、政黨輪替：比較金泳三與金大中

金泳三與金大中在政治改革方面，兩人都因為南韓的憲法所以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進行改革，但由於任期只有五年，且不得連任，也導致了兩人的改革動力指在執政前期，並且金大中與金泳三也都在執政後期被弊案纏身，成為相對弱勢的總統，影響了兩人的政策改革過程；在經濟改革方面，雖然金泳三與金大中都面臨著自由化的浪潮，但是在 1998 年南韓遭遇金融風暴時上任的金大中，順勢的利用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增強了政府對國內經濟的控制能力，成功的帶領南韓度過金融危機；反之在金泳三政府時期，為了繼續的追求南韓的經濟成長，而一再的進行自由化政策，同時也須背負著舊政權的壓力，無法進行改革，財

閱與政府間利益關係依舊存在，也導致金泳三改革失敗的結果，見表 4-2。

表 4-2：金泳三與金大中政經改革之異同

	金融風暴前(金泳三)	金融風暴後(金大中) 政黨輪替
政治改革	同：都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進行改革 兩人都在執政後期弊案纏身，成為弱勢的總統	
	異：保守派 擁有來自舊政權之壓力	異：改革派 與舊政府關係不密切
經濟改革	同：面臨自由化浪潮	
	異：全球化國際潮流下， 一再進行自由化措施 改革失敗	異：來自國際貨幣基金壓力， 採取政府管制政策 改革成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台灣金融海嘯、政黨輪替：比較陳水扁與馬英九

2008 年馬英九的上台也代表著國民黨歷經八年在野後重新取得政權，並且在國會也獲得過半席次之優勢，改變了過去陳水扁執政時期政治不穩定之情形，而馬英九的政策方向也大多異於陳水扁政府，其中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面對兩岸關係的問題上，在陳水扁時期兩岸關係逐漸惡化，也導致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孤立，而在馬英九時期主要的政策目的就在於以經濟發展大幅地改善兩岸關係，也藉此對抗金融海嘯，兩岸並簽訂 ECFA，推動兩岸經貿正常化，以避免台灣陷入邊緣，見表 4-3。

表 4-3：陳水扁與馬英九政經改革之異同

	金融海嘯前(陳水扁)	金融海嘯後(馬英九) 政黨輪替
政治改革	同：上台時都經過了政黨輪替	
	異：朝小野大 兩岸關係惡化 外交孤立(烽火外交)	異：執政黨佔國會多數 大幅改善兩岸關係 活絡外交
經濟改革	同：上台時都面臨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壓力	
	異：二次金改後，政商關係更 密切 一再自由化，政府主導力下 降經濟發展受阻	異：振興經濟方案，擴大內 需與中國簽訂 ECFA 提升國家競爭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南韓金融海嘯、政黨輪替：比較盧武鉉與李明博

盧武鉉與李明博在上台時都正面臨著南韓經濟衰弱的情況，不過形成之原因則有所不同，盧武鉉上台時所要面對的是前任金大中因貪污案以及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影響了北韓陽光政策的執行；李明博則是面臨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進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對於以出口為主的南韓產生很大的影響；至於在對北韓與美國的政策上也有著很大的差異，盧武鉉繼續實施對北韓的陽光政策；李明博則對北韓採取嚴厲的態度，並在相當程度上是交由美國所主導，積極的修復韓美關係；盧武鉉雖然是「反美」的立場，但在現實的考量下，也在 2007 年與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而盧武鉉與李明博的治國理念也大不相同，前者被視為是一個一意孤行的政府；後者則是以實用主義，¹⁹⁵以加強國家競爭力(見表 4-4)。

¹⁹⁵ 林秋山，2008，〈南韓新政府對外政策之走向及背景〉，《展望與探索》，頁 105-109。

表 4-4：盧武鉉與李明博政經改革之異同

	金融海嘯前(盧武鉉)	金融海嘯後(李明博)
政治改革	異：改革派	異：保守派
	北韓：和解路線 美國：反美 → 與美簽 FTA	北韓：強硬態度 美國：加強韓美關係
經濟改革	同：上台時都面臨南韓經濟成長衰弱	
	異：一意孤行，南韓經濟發展停滯	異：務實主義，以提昇國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得知，不論是國際情勢或國內政治環境的改變(如政黨輪替)，都會影響到國家原有之體制，而在面臨到相同的金融危機時，台韓兩國的領導人也都各自提出因應之政策，且重點就在於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符合現況，將國家整體的發展更進一步、更具競爭力，而下一章節將以國家能力與台韓兩國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之間的關聯作為比較。

第五章 台韓國家能力與競爭力

在這一章節將討論關於國家、政府之能力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關係，國家的角色與能力一直都是學界所重視且爭論的議題，而以往學者都習慣以發展型國家理論來解釋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等東亞新興國家，所謂發展型國家就是指國家有能力且善用政策工具，將國內特有的資源投入產業部門，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能力。但在 1980 年代以後，南韓與台灣都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進行了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轉型，並且東亞國家在 90 年代也都先後發生了金融危機，導致發展型國家理論受到了許多的質疑，也因此被學界指為官商勾結、惡性循環，必須加以改造；¹⁹⁶並且政府所做之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能否有效的提升國家競爭力？以下將先討論台灣與南韓在不同時其國家能力的變化，再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簡稱 IMD)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 WEF)所分析之全球競爭力評比排名分別討論台灣與南韓在三個關鍵時刻(1997 亞洲金融風暴、2000 台灣首次政黨輪替、2008 世界金融海嘯、台韓政黨輪替)的競爭力排名變化做說明。

第一節 台灣與南韓國家角色與能力之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帶動國際貿易金額上升，開始出現了全球化的雛形，之後冷戰結束與世界貿易組織致力於貿易自由化，也使得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國家的本質也受到了影響。對於東亞各國在戰後的發展，與其他後進國家模

¹⁹⁶ 林文斌，2008，〈台灣發展型國家的條是或轉型？政府、金融與企業間關係的變化〉，《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七期，頁 95-150。

式的不同，其爭議已經有了廣泛的討論，而此爭議的關鍵點就在於國家的角色。有些學者認為 1960 年代之後，東亞國家經濟得以快速發展，是由於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上採取自由化的措施；但對於發展型國家理論(developmental State)而言，則認為關鍵是政府的領導角色，使得東亞國家得以發展，假如沒有國家的積極干預或扶植，市場本身不會有所發展，¹⁹⁷Evans 則使用了更為複雜的概念「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認為國家自主性並不是單獨存在就能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國家與社會之間必須存在著適當的連結，國家的強度就能夠發展經濟，藉此以理解國家成功涉入產業轉型的結構基礎，Evans 也認為國家有意義的自主性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¹⁹⁸

自 1980 年代開始有關國家的研究開始受到社會科學界的重視，政府角色的議題也日漸突顯，Theda.Skocpol 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一文中將國家視為獨立的行動者，有其偏好，並且國家會依此偏好行動，因此國家的自主性是重要的；¹⁹⁹但是在 1990 年代開始，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挑戰，國家喪失其自主性，政府在面對跨國資本的無力感，國家似乎變得不重要，並且在 1997 年後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無疑地對國家發展模式產生強烈且新的打擊。全球化對經濟的影響，進入了交互影響的政治與經濟權力網絡中，政府也轉向更為開放的政策，所以此時與國家相關的議題大多圍繞在國家如何回應全球化，並且在國內政治與經濟上的調節。²⁰⁰

¹⁹⁷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台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頁 1-45。

¹⁹⁸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¹⁹⁹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43.

²⁰⁰ 陳啟清，2008，〈論國家中心的國家自主性概念變遷—從結構論到鑲嵌性與治理探討〉，《競爭力評論》，第 11 期，頁 47-80。

國家的權力核心逐漸衰退，對於管制經濟的能力也越來越缺乏，各國政府的權力也大不如前，過去政府可以透過其行動去影響經濟與社會，但隨著自由民主意識擴散到世界各地，減少了國家參與經濟的合法性，也削弱了政府對抗市場機制的力量，解除管制的聲浪越來越大，政府越來越無法控制局勢，²⁰¹導致政府無法在面對國際經濟危機與壓力下，提振自己國家的競爭力，而台灣與南韓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與困境，兩國雖然有著看似相同的發展模式，但由於兩國領導人的政策與國情本身的不同，因此對與後來國家整體的表現與競爭力產生不同的影響與結果，圖 5-1 為台灣與南韓政治經濟改革過程中與國家能力的變遷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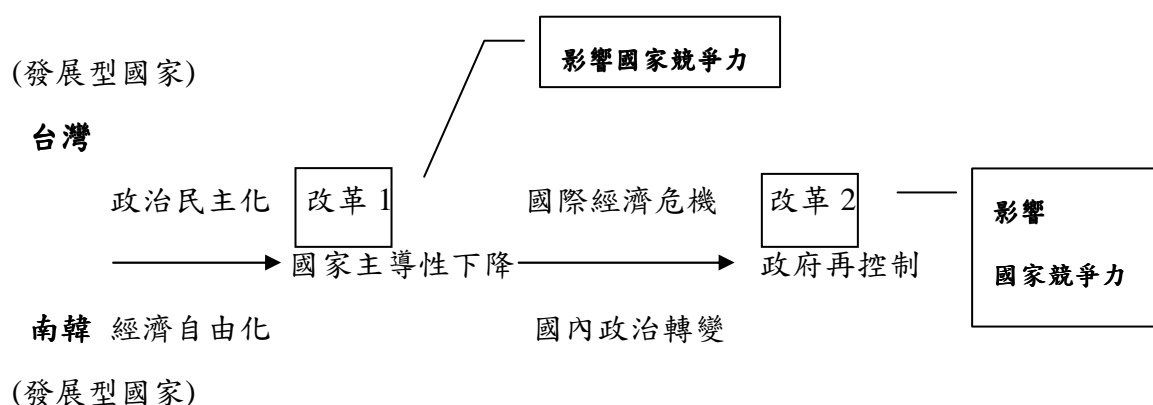


圖 5-1：台灣與南韓政經改革與國家能力變遷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整理以上的論述可以瞭解台灣與南韓原本同為發展型國家，在歷經全球化、自由化之後，發展型國家模式逐漸的受到挑戰，國家無法應付來自全球競爭的壓力，而政府通常在此時會以自由化、開放市場的政策以解決經濟發展停滯等問題，然而台灣與南韓也都無法避免的面臨到因過度自由化而導致政府在危機發生時沒有能力做提早的處理，因而有了再次的改革，政府又再一次的

²⁰¹ 謝俊義，2001，〈基會或威脅-全球化對政府的衝擊〉，《競爭力評論》，第 4 期，頁 37-53。

管制，而這些轉變的過程也對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產生了影響，所以下一節本文將以具體的資料加以分析台灣與南韓兩國各自競爭力的變化。

第二節 關鍵時刻：台韓世界競爭力之排名

台灣與南韓在過去十幾年中有著不同的經濟表現，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兩國受創不一，所採取的改革方式有不盡相同，也影響著後來的國家競爭力。首先，本文將先把國家競爭力做一個簡單的定義，見表 5-1，其次再分別說明「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EF)這兩大世界競爭力其內容指標的差異，見表 5-2 與 5-3。

表 5-1：Michael Porter、IMD、WEF 對國家競爭力之定義²⁰²

	國家競爭力之主要定義
Michael Porter(1990)	從國家層面來看，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國家與產業之關係也正是國家如何刺激產業改善和創新的關係。
IMD (2004)	是一個經濟知識的研究領域，用來分析並找出一些事實與政策，有助於培養一國開創與維持其企業蓬勃發展和人民福祉的優良環境。
WEF (1996)	一個國家達到永續經濟成長及高國民平均所得目標的總體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李明軒、邱如美譯，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頁 3；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我國與東亞諸國總體生產效率與生產力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三十七期，頁 379-414。

當前國際競爭力之評比，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與世界經濟論

²⁰² 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我國與東亞諸國總體生產效率與生產力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 37 期，頁 379-414。

壇所公布的競爭力年報最具公信力與代表性，早期世界經濟論壇是與洛桑管理學院合作，由於後來雙方對競爭力的看法互有差異，所以從1996年開始兩者開始各自獨立進行國家競爭力的研究，且採用不同之國家競爭力評估架構及指標，並將其研究報告出版，其中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評比架構，是延續哈佛大學的Michael Porter 教授的競爭力驅動因素概念進行調整，但也增加問卷調查的資料，以符合國際趨勢，其主要有四個層面：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基礎建設，而每個主要因素又包含了五個次要的因素，總計有三百三十一項(2008年最多)的指標體系來比較不同國家在全球的競爭力，但指標的具體內容也會依每年的報告而有所調整；至於目前的世界經濟論壇(WEF) 則是請哈佛大學的Jeffrey Sachs 教授修正競爭力評估的體系，並且將指標大幅調整，除了統計數據外，也增加了許多問卷調查的主觀資料，²⁰³其主要是以全球競爭力以及企業競爭力兩大指標來評估全球的競爭力；而WEF對於國家競爭力的描述方式也經過了五次重大的變革，配合時代的需求不斷改善或重組指標分類，表5-3則是2009-2010年最新的指標項目。

表 5-2：IMD 國家競爭力重要指標

IMD 國家競爭力指標				
主要因素	經濟表現	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	基礎建設
次要因素	國內經濟	公共財政	生產力	基本的基礎建設
	國際貿易	財政政策	勞動力市場	科技基礎建設
	國際投資	制度架構	金融	科學基礎建設
	就業	企業法規	管理實踐	衛生醫療及環境
	物價	社會架構	態度和價值觀	教育

資料來源：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

²⁰³ 承立平，2011，〈提升國家競爭力-國際競爭力評比架構之運用〉，《研考雙月刊》，第35卷，第2期，頁10-27。

表 5-3：WEF 全球競爭力主要指標

WEF 全球競爭力指標		
兩大指標	全球競爭力指標(GCI)	企業競爭力指標(BCI)
十二項支柱指標	基本需求	
	制度 基礎建設 總體經濟 衛生教育	
	效率提升	
	高等教育與訓練 商品市場效率 勞工市場效率 金融市場成熟度 技術整備度 市場大小	
	創新因素	
	企業成熟度 創新	

資料來源：WEF2009-2010 年全球競爭力年報。

然而，也因為IMD與WEF這兩個機構對於對國家競爭力的認知基礎的不同，因而採用相異之國家競爭力評估架構及指標來衡量，進而產生不同排名的現象，以下表5-4與5-5分別為台灣與南韓在IMD及WEF兩個機構中各自的排名，由於洛桑管理學院的歷史較為悠久，且所評比之四大層面將有助於本文所討論之主要方向，再加上已有2011年的排名，故將其排名時間序列拉長，從1996-2011年做一個完整的排名顯示；而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排名序列中，本文則會關注在2003-2004年之間台灣名次明顯進步以及2007年首度被南韓所超越的焦點上。

表5-4：IMD台灣與南韓1996-2011世界競爭力排名

	時間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台灣	18	23	16	18	22	18	24	17
南韓	27	30	35	38	28	27	29	32

	時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台灣	12	11	17	18	13	23	8	6
南韓	31	27	32	29	31	27	23	22

資料來源：IMD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表 5-5：WEF 台灣與南韓 2004-2010 全球競爭力排名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台灣	5	4	8	13	14	17	12	13
南韓	18	26	19	23	11	13	19	22

資料來源：<http://www.weforum.org/>.

以下本文將把競爭力排名表分為三部分作說明，分別為 1997 亞洲金融風暴與南韓政黨輪替、2000 年台灣政黨輪替、2008 年世界金融海嘯與台韓政黨輪替等三個關鍵時間點。

壹、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南韓政黨輪替

1996 年李登輝總統在五二〇就職演說中提出提升國家競爭力為國家未來施政方向後，當時的行政院長即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革新主軸。行政院隨即成立「提升國家競爭力行動小組」，分別

有委員會及七個工作小組，即總體經濟、國際化與企管、財政金融、基礎建設、生活品質、人力科技、兩岸關係等組，並且為了達成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經建會及研考會每三個月會檢討績效，以落實責任。此外，同年年底召開的國發會，亦提出改善國家競爭力策略的討論，項目包括了改善財政收支、加速基礎建設及擴大民間參與、健全土地制度、檢討能源政策、促進勞資和諧、加強環境保護及提升生活品質等六大項，²⁰⁴然而此時的台灣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政府的監督體系似乎並沒有跟著提升，此外民主化後金權政治的興盛，導致浮濫的信貸不斷出現，再加上受金融風暴之影響，使政府改善國家競爭力的成效在名次反應上似乎有限，台灣在 1996 到 1999 年之間 IMD 競爭力的排名，大抵都維持在二十名上下；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較為嚴重的南韓，其排名則從金融風暴後連續下滑了兩年，但之後在金大中成功的改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之下，南韓在 2000 年時經濟成長迅速，世界競爭力排名也有了大幅的進步，從 1999 的三十八名到 2000 年的二十八名，上升了十個名次，並且南韓也在 2003 年金大中卸任前保持在前三十的排名。

貳、二〇〇〇年台灣政黨輪替

2000 年陳水扁總統在期五二〇的就職演說中也談論到關於提升經濟競爭力、推動政府改造、落實地方自治精神以確保台灣的競爭力之主張。然而台灣 2000 年在 IMD 的排名可能由於經歷了一場激烈的總統大選，在加上首度發生政黨輪替之情況，使得競爭力有下的現象，顯示了政治的動盪影響著國家整體的競爭力，²⁰⁵並且隨後在 2001 下半年又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連帶造成

²⁰⁴ 國政研究報告，2002，〈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FM/091/FM-R-091-020.htm>。

²⁰⁵ 同註 90，頁 32。

台灣經濟衰退、投資環境惡化、政府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不斷增加，不但民間投資意願低落，而且政府的公共投資也所減少，導致台灣的競爭力排名下降到了二十四名。

接著，台灣在2003年到2004年之間，不論是在IMD或是WEF的競爭力排名上都有明顯的進步，其中在WEF的排名更是擠進了前五名，但在進一步觀察WEF的指標項目(見表5-6)則會發現，2003年台灣整體的競爭力之所以表現良好，主要是仰賴高科技產業發展成熟而有良好表現，相反地，在政府的表現方面，總體經濟環境指標排名第十八名，公共部門政策指標排名第二十一名，其次在總體經濟環境指標項下的政府浪費指標為第二十名、國家信用評等指標則為第二十四名表現不佳之外，公共部門兩項分項指標中，合約及法規指標是第二十四名，貪污指標則為第十九名，而2004年的科技與總體經濟指標名次上雖有所進步，但在公共部門政策指標之下的排名都有五名以上的退步，以上數據均顯示出，即使台灣在這兩年之間競爭力的排名雖有進步，然而政府效能不彰也是事實，此外，政府施政的不當造成經濟衰退，也使得台灣政府財政大幅的落後，而政府對重大政策的反覆與搖擺不定，以使得企業對政府產生信任的危機。²⁰⁶

而且在2002年IMD台灣的排名也下滑到二十四名，之後雖在2003-2005年間競爭力的排名持續上升到第十一名，但也可以看出只有在「企業效能」的名次是亮眼的，其他項目仍舊偏低，然而，從2005年開始一直到2007年之間台灣的競爭力排名一路下滑，2006年台灣在IMD的排名較前一年下滑了六個名次，在IMD的四項指標項目排名上，皆較前一年排名下降許多(見表

²⁰⁶ 國政研究報告，2003，〈改進政府效能-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2/TE-R-092-019.htm>。

5-7)，甚至在以往台灣在 IMD 評比中最具競爭力的項目「企業效能」也有明顯的下滑，而其原因很可能是陳水扁所實施之二次金改的爭議，影響了台灣金融市場的環境，在「政府效能」的排名也下滑了五個名次。

表 5-6：2003-2004 年 WEF 的台灣競爭力排名

指標項目	台灣排名	
	2003	2004
成長競爭力排名(GCI)	5	4
科技指標	3	2
1.創新	2	2
2.資訊通訊	7	9
總體經濟環境指標	18	9
1.總體經濟穩定	9	6
2.政府浪費	20	13
3.國家信用評等	24	25
公共部門政策指標	21	27
1.合約與法規	24	31
2.貪污	19	24
商業競爭力排名(BCI)	16	17

資料來源：<http://www.weforum.org/> .

表 5-7：2001-2006 年 IMD 台灣競爭力排名

主要指標	台灣排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整體國家競爭力	18	24	17	12	11	17
經濟表現	26	38	33	24	18	27
政府效能	17	24	20	18	19	24
企業效能	9	16	11	7	6	14
基礎建設	20	20	23	20	18	20

資料來源：IMD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並且 2006 年台灣在 WEF 的名次上也降至第十三名，跌落十名之外，而後來在 2007 年南韓由前一年的二十三名進步至第十一名，更首度的超越了台灣，表 5-8 是 2006-2008 年 WEF 台灣各項排名表，可以發現由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純熟，只有在創新競爭力這項排名是較佳的，而台灣這幾年競爭力的退步，也使得南韓實力有後來居上之樣貌(見表 5-9)。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標主要是由三大類、十二項及一一三個細項組成，三大指標包括「基本需要」、「效率提升」及「創新因素」等。2006-2007 年之間，台灣在「制度」方面在 2007 年時退步七名為第三十七名，台灣在金融市場成熟度也由 2006 年的四十七名滑落到五十八名，退步的幅度最大；其次，在「總體經濟」指標方面，台灣滑落四名為第二十六名；此外，台灣向來表現較好的「創新因素」，在 2007 年亦退步三名，排名第十，其中，企業成熟度排名退步一名，排名第十四；創新指標方面，退步三名，排名第九。

表 5-8：2006-2008 年 WEF 台灣競爭力排名

指標	台灣排名 2006 年	台灣排名 2007 年	台灣排名 2008 年
全球競爭力	13	14	17
基本需求	19	19	20
制度	30	37	40
基礎建設	21	20	19
總體經濟	22	26	18
衛生教育	8	6	20
效率提升	15	17	18
高等教育與訓練	5	4	13
商品市場效率	14	17	14
勞工市場效率	10	22	21
金融市場熟度	47	58	58
技術整備度	13	15	15
市場大小	16	16	16
創新因素	7	10	8
企業熟度	13	14	12
創新	6	9	7

資料來源：<http://www.weforum.org/>.

表 5-9：2006-2008 年 WEF 台灣與南韓排名比較

時間	台灣				南韓			
	2006	2007	2008	變動	2006	2007	2008	變動
WEF 排名	13	14	17	-4	23	11	13	+10

資料來源：<http://www.weforum.org/>.

但不可否認地，台灣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期間，不論是洛桑管理學院(IMD)或是世界經濟論壇(WEF)所發布的世界競爭力排名，表面上看來似乎都維持著一定的水準，甚至有著名列前茅的

佳績，但再細看則會發現台灣在 2005 年之後，競爭力有下滑的趨勢，並且在政府效能與金融市場成熟度以及體制等項目則是落後且退步的，反觀南韓，雖然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上整體是遠落後於台灣的，但是在經過亞洲金融風暴以及金大中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壓力下，金融體制的改革成功，造成其日後在世界上經濟表現亮眼，甚至在 WEF 的排名一度超越了台灣。總之，國家在面對經濟危機時都會厲行改革，以求恢復經濟穩定，而我國雖遭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較小，但政府對經濟改革的積極程度仍然會影響著國家的競爭力。

雖然當時陳水扁一在宣稱台灣依然有許多地方都贏過南韓，但是 IMD 與 WEF 都顯示了台灣的問題在於，台灣仍無法擺脫社會凝聚力、政策一致性、政府官員的缺乏效能以及政府不穩定之弱勢，而南韓則在先前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時金大中的成功改革下，使南韓得以穩定的發展，可以說是由於當時的南韓推動金融改革的成功，加上沒有發生重大金融事件；並且當時南韓總統盧武鉉又與美國順利的簽署 FTA，法規大幅鬆綁；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和緩等等有利條件，²⁰⁷都是南韓得以大幅進步的因素。

參、二〇〇八世界金融海嘯、台韓政黨輪替

2008 年台灣與南韓各自都發生了政黨輪替，以及也都同樣遭受到世界金融海嘯之衝擊，然而在 IMD 與 WEF 的排名上卻有很大的出入，由其是台灣在 IMD 所發佈 2008-2011 年間的排名起伏高達十名以上，其中在 2008-2009 年台灣退步了十名(見表 5-10)，但同時卻在 WEF 的排名上進步了五個名次(見表 5-11)。

²⁰⁷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7，〈我國 2007 年 WEF 競爭力排名首度被南韓超越之評析〉，<http://www.npf.org.tw/post/3/3537>。

表 5-10：2008-2011 年 IMD 台灣主要指標排名

主要指標	台灣排名			
	2008	2009	2010	2011
整體國家競爭力	13	23	8	6
經濟表現	21	27	16	8
政府效能	16	18	6	10
企業效能	10	22	3	3
基礎建設	17	23	17	16

資料來源：IMD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表 5-11：2008-2010 年 WEF 台灣各項指標排名

指標	台灣排名		
	2008	2009	2010
全球競爭力	17	12	13
基本需求	20	18	19
制度	40	38	35
基礎建設	19	16	16
總體經濟	18	25	20
衛生教育	20	15	11
效率提升	18	17	16
高等教育與訓練	13	13	11
商品市場效率	14	14	15
勞工市場效率	21	24	34
金融市場熟度	58	54	35
技術整備度	15	18	20
市場大小	16	17	17
創新因素	8	8	7
企業熟度	12	13	13
創新	7	6	7

資料來源：<http://www.weforum.org/>.

而導致兩個機構評比差異懸殊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兩者對國家競爭力之定義不同，所採納之分類項目也所差異；一方面則是評比之方式，如IMD採用的統計資料較多，而當時又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使得在經濟表現、企業效能方面反差較大，而WEF所使用的問卷調查資料較多，並且自2009年開始，WEF在處理問卷資料時，會將當年及前一年的企業調查結果經過加權平均後再做評比，以避免全球發生重大經濟事件時，會影響企業調查結果，而產生異常的波動。²⁰⁸

另外，由表 5-4 也可以發現 2009 年在台灣退步十名的同時，南韓卻小幅進步了四個名次，同樣是面臨世界金融海嘯與政黨輪替，但是南韓在李明博政府上任後，實施已經濟為優先的政策，並在對外貿易上也非常的積極，另外在創新、研發、品牌和通路上都有一定的表現，這也是其排名能進步的原因；至於台灣雖然馬英九上任後，也主要是以改善經濟為其主要政策目標，但在 2009 年 IMD 排名中退步最多的卻是「企業效能」，其次則是「經濟表現」與「基礎建設」(見表 5-10)，也顯示出政府所實施之振興經濟方案成效似乎不明顯，以及在對關鍵技術與研發能力也有待加強，然而，隔年(2010)台灣在 IMD 的排名上卻有著大幅的進步，一舉從二十三名晉升到第八名，而導致台灣名次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企業效能」和「政府效能」兩方面的強化。企業效能由去年的二十二名升至第三名，政府效能則由十八名進步至第六名，而這些名次的提升可能與政府積極與中國大陸密切的經貿合作有關。

今年 IMD 最新公佈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台灣更是進步到了第

²⁰⁸ 謝中琮，2010，〈如何提升我國競爭力—由 IMD 及 WEF 國際競爭力指標探討〉，《經濟研究》，第 11 期，頁 63-90。

六名，也因此可以發現由於 2008 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導致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對於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等等國家，必定會造成不小的衝擊，而從上結敘述可知為因應此危機政府也展開了一連串有利經貿發展的政策，而兩岸經貿合作架構協議(ECFA)也讓台灣與中國在經濟上有更密切的交流，強化企業的信心，更利於台灣經濟的發展，成功的提升了台灣的競爭力，但是也不可忽略的是在「政府效能」的排名上，確實較 2010 年下滑了四個名次，降至第十名，而根據經建會的說明，是由於「公股影響企業活動」與「官僚行政影響企業活動」退步最明顯，例如油價緩漲機制、公股銀行併購等，政府介入企業的案例，然而若只單方面進行自由化的措施，則會導致國家在面對危機時無法做出即時的反應，如同南韓在金泳三一昧自由化政策之下遭遇到亞洲金融風暴嚴重的衝擊，因此台灣政府在自我角色這方面還須做適度的調整。

雖然 IMD 和 WEF 對競爭力的評比標準並不相同，評比的項目也不同，每年的評比結果也會有所出入，在討論國家之競爭力時也不能只單看表面的排名，然而從上述的討論仍然看出不論是國際環境的壓力或是國內政治的動盪、領導人的不同，都會影響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第六章 結論

長久以來，台灣與南韓同屬於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一直處在相互競爭的地位，而台灣也一直是領先於南韓的，但卻在歷經 1997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在南韓政府積極的改革下，使得經濟能夠快速的成長；而台灣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政府也有從事很多方的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向可能與現實的環境有所差異，導致南韓逐漸超越了台灣。而本章將先對先前的討論作整理，提出研究上的發現，再針對台灣未來該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作為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首先，本文先將比較台灣與南韓政治體制以及經濟策略上的差異，對於執政者改革上之影響，接著在比較台灣李陳水扁、馬英九，以及南韓金大中、李明博在關鍵時刻所執行之政策與其對國家之影響。

壹、政治結構

台灣與南韓都在 1980-1990 年代時，受到第三波民主化運動的影響，在制度方面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如南韓在 1987 年通過第六共和憲法，將總統恢復為人民直選，而台灣則在 1992 年提出修憲將總統改為直選，於 1994 年確定總統為人民直選，然而兩國在總統任期與權力卻有著明顯的差異(表 6-1)。

表 6-1：台灣與南韓總統制度之比較

	台灣	南韓
選舉方式	人民直選	人民直選
總統任期	四年	五年
連任條件	得連選連任一次	不得連任
實質權力	較小	較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而南韓總統不論事在人事任免權上，或是擁有的緊急命令權，其權力都比台灣總統來得大，也因此兩國國內政治體制本身的不同，也會對改革的效果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如南韓總統都幾乎是大總統制下的受益者，在改革上較不受限制，再加上南韓總統不得連任，且一上任就可以大幅的對政府組織進行改組，在沒有連任選舉的壓力下，可以盡情的改革，相較於台灣，總統可以連任一次所產生的連任壓力，導致政府組織無法對於政策作出立即的修改，但是南韓也因每位總統只有一任，也造成了其改革的動力通常只有在執政前期，政策也難以連續。

至於在政黨結構方面，南韓的政黨長期都是屬於繁複的分合、政黨明顯的個人化、地域化；台灣則是擁有兩個主要的政黨長期競爭，雖然兩國政黨都各自會遇到內部分裂的問題，但是由於在南韓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不像台灣的政黨有著明顯的對立，而這也有利於南韓領導者的改革或是整體的經濟發展上。

貳、經濟結構

在 1970 年代台灣與南韓的經濟發展結構都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下進行，但在 1990 年代以後受到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衝擊下，政府主導的能力也大不如前，而經濟一直落後於台灣的南韓，

到九〇年代後，在產業發展上則快速的超越了台灣，以下分別就兩國的產業政策與在危機時兩國政府所運用的策略作比較整理。

南韓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以出口導向政策，早期產業結構是以大企業為主，偏向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奠定了今日南韓工業的雄厚基礎，而由先前之討論可以了解南韓經濟成功發展的原因是由於政府與企業相互依靠的關係，然而此種模式卻在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暴露出南韓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而南韓之所以會發生金融危機變是因為長久以來政策的不當和金融制度的不健全，同時在政府實施自由化措施之下，也廢除了許多管制政策，也使得銀行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所以金大中上任後便是針對南韓政府與企業，以及金融體制最為主要改革之目標。

台灣也是以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早期則是以中小企業且勞力密集型為主，而台灣之所以相較於南韓在亞洲金融風暴受創較輕，主要是因為台灣有較健全的管制體系，但卻在政黨輪替後陳水扁持續推動第一次與第二次的金改，雖然也是在改善金融體質、鼓勵金融機構合併，但在過程中卻有圖利財團、過多的政治意識形態干預，二次金改的失敗，也影響了台灣當時整體的世界競爭力排名，接著本文將針對兩個關鍵時刻之執政者作比較。

一、亞洲金融風暴、台韓政黨輪替：陳水扁與金大中

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與台韓政黨輪替後的金大中與陳水扁之間的差異表現得最為明顯之處在於，同樣在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以及金融危機之下，南韓的國家並沒有因此而退出對市場的干預；但台灣卻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期間，國家一直被政治惡鬥所操控，導致無法有效地發揮其功能，進而影響台灣在國際競爭的優勢(見圖 6-1)。

1997 亞洲金融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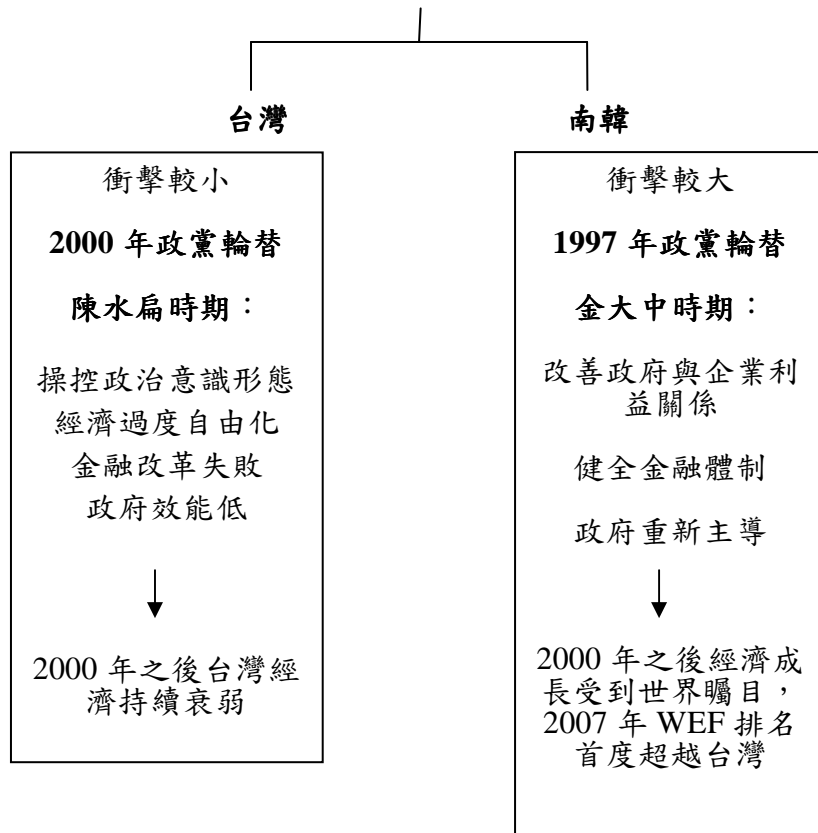


圖 6-1：陳水扁與金大中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此，南韓之所以可以從 1997 亞洲金融風暴的困境中順利的度過，並且其後的經濟也有亮眼的發展，主要是因為金大中所執行的政經改革，不再只是一味的過度自由化，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順利改革南韓政府與大企業官商勾結的弊端，而金大中與陳水扁在國內政策上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水扁是進行自由化與開放，使得政府與企業間之政商關係也越來越密切，而當時台灣政治鬥爭頻繁，社會分裂加劇，也導致政府能力大幅下降，國家機器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失去其能力與自主性，影響台灣的經濟發展；相較之下，金大中則加強了政府對國內經濟的管制能力，南韓也在金大中的成功改革下，邁向穩定發展的未來。

二、世界金融海嘯、台韓政黨輪替：馬英九與李明博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經濟嚴重的衰退，台灣與南韓也不免在這波風暴中受到影響，並且兩國也分別發生政黨的輪替，而馬英九與李明博在當選時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如上台時都須面臨全球經濟的危機，以及兩者都是昔日代表保守派政黨再次取得政權，也都是以經濟為優先的政策(見圖 6-2)，不過在面對中國與北韓的態度上，馬英九方面則是希望藉著與中國密切的經貿合作，以藉此對抗金融海嘯；李明博方面則是改變過去金大中與盧武鉉的陽光政策與和解路線，積極修復韓美關係，此舉提高了朝鮮半島緊張的情勢，至於在面對金融海嘯上李明博提出的振興經濟計劃主要包含了減稅、擴大公共建設支出以及建立換匯機制，以度過因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經濟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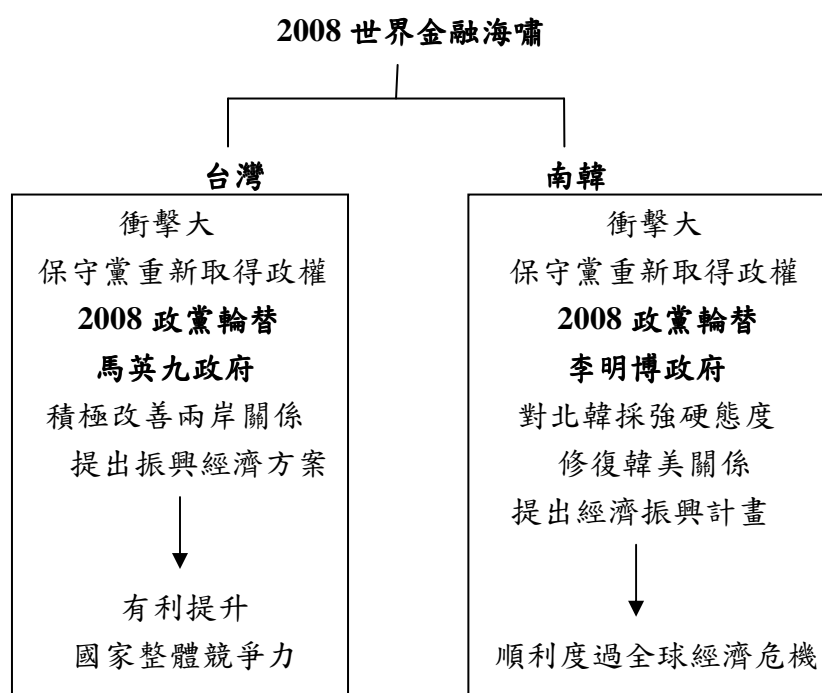


圖 6-2：馬英九與李明博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討論，台灣與南韓都在實施自由化政策之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逐漸的減少，而自由化的政策在國際上是放寬資本的流動，在國內則是鬆綁制度層面，例如前述台灣開放銀行的成立，以及南韓在金泳三上台後所實施的全球化政策，都是自由化的表現。對許多國家而言，不只是台灣與南韓，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陷入過度自由化的危機，並且在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中做選擇，並且國家也應該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須能穩定市場，在不受私人利益的影響下，有能力去執行既定的政策，也就是在政治方面要能維持其自主性，穩定的政局、健全的體制以及強制性的法規都能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正面的效益。

另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台灣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固然重要，但畢竟這些競爭力的排名只能代表短暫的消長，真正要著重的是維持國家良好的機制，當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雖受到了肯定，但也不能忽略產業的轉型或是就業等等問題，並且在政策執行上也應表現得更強而有力，使台灣不論是政治或經濟面向上都能在全球中有亮眼的表現。

第二節 未來展望

隨著金融海嘯的衝擊逐漸退去，在全球市場不確定的情勢下，台灣與南韓也都各自體會到產業結構與經濟策略的重要性，若整體經濟發展的模式，只是一昧地追求經貿自由化，讓企業追求市場的利益，是無法真正的達到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目標，從以上南韓對經濟發展的思維以及政府治理的能力，再對照台灣的現況，可以看出台灣目前產業結構所面臨到的問題，首先在於

結構過於集中，雖然高科技的資訊產品是我國經濟發展上具有競爭優勢之部份，但是高度集中於高科技的產品與產業，導致台灣產業發展無法因應國際環境快速的變化，其次在關鍵技術上，政府應協助企業朝更有深度的研發，以強化台灣的創新效率與能力。

在當前政府一連串有利台灣經貿發展的政策之下，也讓台灣的競爭力排名大幅提升，而不可否認的，台灣若經濟要成功，經貿發展佔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必須參與區域化與全球化的經濟整合，這當然包括了兩岸的經貿發展，²⁰⁹而目前政府與中國所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雖然台灣可藉此吸引更多國際投資，甚至提高國際競爭力，並且也有利於台灣在中國這個大市場與日本或南韓等國的產品競爭，但這終究只是台灣整體經貿架構的一環，政府也不可忽視台灣產業所面臨市場過度集中的難題。

最後，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上一直視台灣與南韓在整個經濟發展中所要面對的問題，是政府主導或是放任市場自由，是在經濟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大難題，政府不應該完全從市場中退出，也不該過度的干預市場，因此，政府應該採取一個更適當、有效率的管理，並且在面對外來壓力時，必須採去更主動積極的態度，而不是一昧地隨著整個社會環境而搖擺不定，而這也是目前台灣政府所須改善的。

²⁰⁹ 宋鎮照，2009，〈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思維與新策略：從經貿整合到政治趨和〉，《全球政治評論》，第28期，頁63-93。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份

一、書籍

- 王佳煌、潘中道等譯，W. Lawrence Neuman 著，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
- 王逸舟譯，米爾斯著，《權力菁英》。台北：桂冠。
-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編著，1992，《以民意修憲向歷史負責》。台北：中央文物。
- 朱道凱譯，瞿宛文、安士敦著，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
- 李在方，2008，《韓國崛起》。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
- 李明軒、邱如美譯，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
- 李隆生、張逸安譯，理查·維特著，2007，《國家競爭力》。台北：聯經。
- 李振昌譯，Richard Rosecrance 著，2000，《虛擬國家：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台北：聯經。
- 宋鎮照等著，2009，《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
- 吳家興，2005，《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
- 吳重禮、吳玉山編，2006，《憲政改革-背景、運作與影響》。台北：五南。
- 呂亞力，2008，《政治學從權力角度之政治剖析》。台北：東華。
- 林文程，2000，《李總統執政十二年與台灣成就》。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
- 林秋山，2009，《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台北：台灣商務。

- 林庭瑤譯，Kate Nash 著，《全球化、政治與權力》。台北：韋伯。
- 林義鈞，2005，《台灣國家能力與國家認同之關係》。台北：秀威。
- 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
- 孫同文，2003，《從威權政府到民主治理》。台北：元照。
- 唐世平編，2005，《冷戰後近鄰國家對華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袁鶴齡編，2003，《全球化 VS 區域化：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台北：鼎茂圖書。
- 張啟雄編，2002，《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 陳水扁，2001，《世紀首航》。台北：圓神。
- 陳國祥編，2008，《哭泣的台灣-看民進黨執政八年》。台北：INK。
- 彭懷恩，2003，《台灣政治發展》。台北：風雲論壇。
- 彭慧鸞，2008，《番薯與泡菜：亞洲雙龍台韓經驗比較》。台北：亞太文化基金會。
- 葉俊榮，2003，《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北：元照。
- 董向榮，2009，《南韓創造奇蹟》。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劉北成、許虹編譯，帕累托著，《菁英的興衰》。台北：桂冠。
- 蔡增家，2005，《南韓轉型：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台北：巨流。
- 蔡政文，2009，《2009年台灣展望》。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閻紀宇譯，Fukuyama 著，2005，《強國論》。台北：時報文化。
-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 蕭全政，1995，《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台北：時英。
- 蘇希亞譯，康燦雄著，2004，《貪瀆者-韓國奇蹟與菲律賓經驗》。

台北：早安財經文化。

二、期刊文章

- 王振寰，2002，〈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7 期，頁 85-139。
-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台灣社會學刊》，第 31 期，頁 1-45。
- 王建全，1996，〈新政府須強化台灣產業升級競爭力〉，《經濟前瞻》，第 45 期，頁 54-61。
- 朱松柏，1999，〈南北韓新政府的統一政策及其進展〉，《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1 期，頁 19-29。
- 朱景鵬，2009，〈從國際競爭力評比析論政府效能提升之道〉，《研考雙月刊》，第 33 卷，第 2 期，頁 19-29。
- 河凡植，2008，〈和平繁榮政策與中韓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頁 127-149。
- 李大中，2010，〈歐巴馬政府之東北亞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9-26。
- 李東華，1998，〈韓國大企業的危機及改革〉，《經濟前瞻》，第 60 期，頁 68-74。
- 李南周，2009，〈對韓國蠟燭運動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4 期，頁 445-456。
- 宋鎮照，2009，〈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思維與新策略：從經貿整合到政治趨和〉，《全球政治評論》，第 28 期，頁 63-93。
- 余慕薌，2008，〈日韓政府祭出經濟振興方案期待新年新氣象〉，《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1 卷，第 12 期，頁 76-81。
- 林文斌，2008，〈台灣發展型國家的條是或轉型？政府、金融與企業間關係的變化〉，《政治科學論叢》，第 37 期，頁 95-150。

- 林秋山，2008，〈南韓新政府對外政策之走向及背景〉，《展望與探索》，頁 105-109
- 邱達生，2009，〈全球經濟危機與亞洲情勢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2 卷，第 6 期，頁 80-87。
- 承立平，1996，〈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基礎與基礎建設〉，《經濟前瞻》，第 48 期，頁 44-48。
- 承立平，2011，〈提升國家競爭力-國際競爭力評比架構之運用〉，《研考雙月刊》，第 35 卷，第 2 期，頁 10-27。
- 姚文成，2009，〈二次金改金融監理制度-個案與檢討〉，《績效與策略研究》，第 6 卷，第 2 期，頁 1-17。
-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6 期，頁 86-95。
- 張英，1995，〈金泳三總統的新韓國論簡析〉，《韓國學報》，第 13 期，頁 146-154。
- 陳元保，1996，〈總統大選前後的金融政策〉，《經濟前瞻》，第 45 期，頁 54-61。
- 陳牧民，2010，〈主權理論與當前台灣外交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05-124。
- 陳新之，2004，〈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7 期，頁 19-45。
- 陳啟清，2006，〈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論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與社會》，創刊號，頁 31-80。
- 陳啟清，2008，〈論國家中心的國家自主性概念變遷-從結構論到鑲嵌性與治理探討〉，《競爭力評論》，第 11 期，頁 47-80。
- 黃台心、陳盈秀、王美惠，2009，〈我國與東亞諸國總體生產效率與生產力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 37 期，頁 379-414。
- 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架構〉，《問題與

- 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頁 145-169。
- 詹中原，1998，〈國家競爭力與企業政府精神〉，《研考雙月刊》，頁 6-18。
- 楊日青，2003，〈憲政運作之亂象及改進之道〉，《國家政策論壇》，冬季號，頁 1-12。
- 楊日青，2006，〈憲政之困境與出路〉，《台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103-123。
- 楊以彬，2006，〈南韓民主化過程之簡析-以 Huntington 民主化理論為分析觀點〉，《人文與社會》，第 1 卷，第 9 期，頁 301-331。
- 劉性仁，2010，〈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台灣發展之效益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7 期，頁 90-107。
- 劉宜君，2007，〈全球化與國家財政職能的轉換〉，《競爭力評論》，第 4 期，頁 11-32。
- 劉靜容，2009，〈金融海嘯席捲後，亞洲各國如何力挽狂瀾？〉，《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2 卷，第 3 期，頁 97-104。
- 蔡東杰，2008，〈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及其戰略布局〉，《東亞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179-196。
- 蔡增家，2005，〈管制、自由化與再管制：2000 年之後台灣與南韓政經轉型之比較〉，《中政會論文》，頁 1-23。
- 蔡增家，2008，〈政府主導與經濟發展：金大中時期南韓大企業改革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22 期，頁 1-32。
- 薛立敏，1997，〈WEF、IMD 對國家競爭力的衡量有何不同〉，《經濟前瞻》，第 52 期，頁 90-99。
- 謝中琮，2010，〈如何提升我國競爭力—由 IMD 及 WEF 國際競爭力指標探討〉，《經濟研究》，第 11 期，頁 63-90。
- 謝俊義，2001，〈基會或威脅-全球化對政府的衝擊〉，《競爭力評論》，第 4 期，頁 37-53。

瞿宛文，2004，〈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3 期，頁 29-59。

蘇子喬，2010，〈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1991-2010)：歷史制度論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頁 147-223。

蘇顯揚，1999，〈金融風暴下的日本與韓國〉，《經濟前瞻》，第 62 期，頁 40-44。

龐建國譯，Peter B. Evans、龐建國著，〈國家結構與國家政策：台灣經驗對興新工業化國家的意涵〉，《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43-53。

三、學位論文

李本善，2000，〈台灣民主化後的政經改革-李登輝、陳水扁時期之探討〉，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

張剛嘉，2002，〈政治安定、經濟結構與民主鞏固：比較台灣與南韓〉，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

四、網路資料

TVBS 民調中心，2008，〈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滿意度調查〉，<http://www.tvbs.com.tw/>。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日韓港星振興經濟之作法及對我國之啟示〉，www.cepd.gov.tw/dn.aspx?uid=116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南韓經濟改革及其成效之研析〉，www.cepd.gov.tw/dn.aspx?uid=1204。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金融危機因應機制之研究〉，www.cepd.gov.tw/dn.aspx?uid=1190。

- 郭秋榮，2002，〈主要國家金融監理制度變革及其對我國之啟示——兼論我國規劃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www.cepd.gov.tw/。
- 國政研究報告，2003，〈改進政府效能-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2/TE-R-092-019.htm>。
- 國政研究報告，2002，〈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FM/091/FM-R-091-020.htm>。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7，〈我國 2007 年 WEF 競爭力排名首度被南韓超越之評析〉，<http://www.npf.org.tw/post/3/3537>。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9，〈2009 年應全力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之交通建設以振興經濟〉，
<http://www.npf.org.tw/post/3/5252>。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7，〈民進黨政府治理之政治經濟分析--以 BOT 為例〉，<http://www.npf.org.tw/post/2/2416>。
- 遠見雜誌民調中心，2008，〈馬英九總統暨新政府就任民調〉，
<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87316423171.pdf>。
- 聯合報系民調中心，2008，〈陳水扁施政滿意度〉，
<http://mag.udn.com/mag/abian/storypage.jsp>。

貳、西文部份

(I)Books

Alice H.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deski, Robert,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Reform*

- and Reconstitution in the Sixth Republic under Roe Tae Woo, 1987-1992*, NY: Routledge Press.
- Chalmers, Johnson,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l, Anthony, 2002,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n Howard J. Wirda,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 Westview Press.
- Guy, Peters, 1996,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ld and New,"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2007, "Extract from the Third Wave," *Democracy*, NY: Routledge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99, "The developmental : odyssey of concept,"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Meredith Woo-Cumings(ed),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igdal, Joel S, 2002,"The State in Society," In Howard J. Wirda,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 Westview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Paul and Theda, Skocpol, 2006,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US: Harvard University.

Tony, Smith, 2002, "The Dependency Approach," In Howard J. Wirra,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 Westview Press.

Vanhanen, Tatu, 2003,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ountries*, NY: Routledge Press.

Woo-Cumings, Meredith,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I) Periodicals

Almond, Gabriel A, 1988, "The Return to the State." In Alan S. Zuckerman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documents*, Vol.2, pp.134-160.

Bunce, Valerie, 2000,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In Alan s. Zuckerman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documents*, Vol. 2, pp. 364-392.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1, pp. 1-40.

Hall A. Peter and R.C.R. Taylor ,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pp. 936-957.

J. P. Nettles, 1968,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In Alan S.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Vol. 2,

pp. 42-71.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pp. 251-267.

Michael, E. Porter, 200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4-2005*.

Polidano, C, 2001, "Don't Discard State Autonomy: Revisiting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pp. 513-527.